

本期导读

本刊编辑部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70 年前, 亿万的中华儿女, 用自己的热血乃至生命, 英勇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洗刷了中华民族百年以来的耻辱。为了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本期《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专栏特推出《怀中利剑 袖中匕首——赣榆武工队的战斗故事》《鲜为人知的抗战书籍 <血战敌后的一一五师>》《抗战时期的东海白河培训班》《抗战时期赣榆县流通的货币》《七十多年前的一场屠杀》等文章, 讲述那些发生在连云港的战斗史实。

2010 年 7 月, 江苏省省委书记梁保华在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第一梯级站滨海抽水站启动了送水控制按钮, 一泓江水滚滚北上, 直达江苏省最东北端的赣榆县, 这标志着 1958 年规划的通榆河开挖工程, 经过几代江苏人抢抓机遇实施, 终于在 52 年后全线贯通, 圆了江苏北调江水的梦想。从此, 在江苏省的版图上出现一条与京杭大运河江苏段基本平行的东部沿海南北向河道。张卫怀先生撰写的《抢抓机遇开挖通榆河 北调江水梦想终成真》回顾了通榆运河这项前后 52 年的水利工程的艰辛历程。

提起贾圩, 大部分港城市民也许并不知晓, 但提起苏宁广场, 应该是妇孺皆知。其实这两个名字说的是一个地方, 即位于港城中心城区龙尾河畔, 也就是现在新地标拔地而起、耸入云霄的苏宁广场处, 这一区域, 就叫贾圩。这里已成为海州区的

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商贸物流圈。那么, 这么一个繁华的现代化商业中心, 为什么叫这个“土里土气”的名字呢? 韩世泳老先生撰写的《贾圩百年巨变》一文纵述百余年来贾圩的发展变化, 从中也可洞见连云港中心城区的发展轨迹。

《新安镇源流》成文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 刊载于清乾隆年间冯仁宝编印的《新安镇志》扉页上。该文记述了明崇祯九年(1636 年)将张店镇之南的悦来集, 正式命名为新安镇以及建镇取名的过程和所属人口的来源情况。这是一本最早记述新安镇得名和人口来历的地方志书, 虽不全面, 但脉络清楚。《对 <新安镇源流> 一点考证》一文对其中有关“洪武赶散”与苏州阊门移民苏北的情形作了进一步考证, 以慎终追远, 溯本求源。

近年来, 红色旅游持续升温, 这种既能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又能放松身心、增加阅历的主题旅游形式越来越受到游客的欢迎, 逐渐成为假日旅游、假日经济的一个新热点, 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连云港作为革命老区, 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 同时, 连云港也是一座在国内外拥有一定知名度与影响力的旅游城市。因此, 把连云港地区相对丰富的红色资源与旅游业对接, 积极发展具有连云港特色的红色旅游, 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革命传统教育、推动连云港市经济建设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详见徐亮的《连云港市发展红色旅游的资源分析与基本对策》。





《连云港史志》编委会

顾问 (以姓氏笔画排列)

古龙高 刘畅征
许燕婁 杨春生
李洪甫 张良群
张学贤 张树庄
张建民 彭云
韩世泳

主任: 苏中保

副主任: 张斌 赵廷旗
陆瑞萍 魏鹏

委员 (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淙 王滨
白植明 朱荣
刘鹏 邱仕明
何洪斌 陈毅敏
胡卫星 姜龙才
郝芳 戚盼德
韩翠林

主编: 苏中保

副主编: 张斌 赵廷旗
陆瑞萍 魏鹏

责任编辑: 邱仕明 张伟敏
于冰清

文字总校: 张骏鹏

目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专栏

04 怀中利剑 袖中匕首——赣榆武工队的战斗故事

/ 葛华

09 鲜为人知的抗战书籍《血战敌后的——五师》

/ 王晓华

12 抗战时期的东海白河培训班

/ 王宗富

14 抗战时期赣榆县流通的货币

/ 祝新华

16 七十多年前的一场屠杀

/ 张骏鹏 常锦岗

18 云台山上的丰碑——抗日石刻与连云港保卫战(下)

/ 李彬

22 连云港抗战大事记(四)

/ 本刊编辑部

历史与发展

24 抢抓机遇开挖通榆河北调江水梦想终成真

/ 张卫怀

郁洲溯源

28 贾圩百年巨变

/ 韩世泳

31 对《新安镇源流》一点考证

/ 耿中太 韩翠林

33 凌州曾是煎盐处——寻古云台十八村之十

/ 伏广喜 闫祥富 杨庆昌

地方文化研究

36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一)

/ 刘凤桂

40 “千岩万壑”续鹤缘——记东磊一组石刻的人和事

/ 刘洪雨



录

史海钩沉

42 历史上的济南盐场

/ 胡可明

史志论坛

46 连云港市发展红色旅游的资源分析与基本对策 / 徐 亮

封二:史志掠影

封三:血战连云

——连云港抗战石刻精选



好消息!

成功关注“连云港史志”微信获赠2016全年连云港史志
“了解港城历史的窗口”,欢迎您关注连云港史志官方微信!
(查找公众号“连云港史志”或手机扫描左侧二维码加关注)

成功添加关注,阅读点赞,截屏图片发 lyshitan@163.com,
注明通联地址,可免费获赠2016全年连云港史志内刊。

本刊编辑部

纵览历史借古鉴今
展现风貌追溯渊源
立足港城洞开窗口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地址: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69号

邮编:222006

网址: www.lyasz.gov.cn

电子邮箱: LYshitan@163.com

电话: (0518) 85825137 85821368

印刷:连云港市百草园教育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苏新出准印JS—G033号

出版日期:2015年8月

2015年第4期总第100期

(内部资料 赠阅交流)



怀中利剑 袖中匕首

——赣榆武工队的战斗故事

葛 华

武工队是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因战争的需要而组织成立的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武装。武工队经常深入敌后战斗,抓汉奸、摸据点,惩恶扬善,分化瓦解日伪军,配合主力部队完成一些艰难的特殊战斗任务,因此又被誉为我军的“怀中利剑,袖中匕首”。

赣榆武工队成立于1942年,直属八路军115师教导2旅敌工科。1943年3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原滨海军分区升格为滨海军区。滨海军区先后建有7个武工大队,1944年初成立的第五武工大队(大队长罗光、政委李光明),因主要活动在赣榆敌后,又称赣榆武工大队,下辖3个中队,直属军区领导。

武工队员既要政治素质高,又要军事技术强,既机智勇敢又艺高胆大,特别强调要有独立作战的能力。他们都是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创造了许多神话般的战斗奇迹。

最牛的武工队员宋继柳

在赣榆武工队,要说杀敌谁最牛,不论是军区首长还是百姓群众都会伸出大拇指赞道:“宋继柳最牛!”就连日伪军也都畏宋如虎,赌咒发誓都是说:“谁要不凭良心做事,叫他出门遇到宋继柳!”

宋继柳,赣榆县宋庄镇柳行村(后迁居宋庄村)人。1908年出生,自幼家贫。5岁开始讨饭,13岁上船雇工挣钱接济家用。常年的海上生活,练就了宋继柳超人的胆略和非凡的身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宋继柳加入了国民党爱国县长朱爱周组织成立

的保安大队,在第二区中队当兵,追随朱爱周抗击日军。

1940年3月,朱爱周殉国后,国民党顽固派董毓珩执掌县政,走向反共亲日的投降道路。宋继柳愤而离队,后于1941年初参加八路军赣东游击大队。宋继柳作战机智勇敢,身手敏捷,武艺高强,善于独立完成艰巨的战斗任务,被先后调到赣榆县武工队、滨海军区武工队和赣榆县委敌工部工作,长期活动在赣榆南部朝阳、清河等敌占区。宋继柳胆大机警,枪法极准,出枪速度快于常人数倍,经常出其不意偷袭日伪军。

1942年2月12日(农历腊月二十七)夜,驻下口四桥据点一个班的伪军,睡得正香,突然房门被宋继柳轻轻拨开,大喝一声:“宋继柳来了!”刚刚还打着呼噜的伪军们条件反射般地蹦了起来,一个个赤条条的举起了双手,做了俘虏。原来日军侵占赣榆南部地区后,在青口以东的下口、黄沙和一二三四桥都安设了据点以控制下口出海口。驻下口四桥的这班伪军每天都勒索讨桥的渔民百姓,还经常到附近的村庄抢掠骚扰。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宋继柳多次在据点附近喊话,教育他们要改恶从善。但这帮伪军依仗距青口近,日伪军大队增援方便,有恃无恐,对宋继柳的教育置若罔闻,继续作恶,终于在睡梦中做了宋继柳的俘虏。

1942年10月,八路军115师教导2旅6团敌工干事韩成林化名徐华在朝阳区执行任务,住在大朱庄乡长朱某的家中,这乡长表面上是日伪的乡长,其实是我敌工部的内线关系。一天,韩成林在沙



口村被下乡清乡的日伪军抓捕,转送新浦日军宪兵队关押、审讯,受尽毒刑。韩成林坚贞不屈,咬定自己是山西来到赣榆做牛禽的盐商,始终没暴露真实的身份。朱乡长万分着急,赶紧向敌工部汇报。教导二旅政委符竹庭亲自组织营救韩成林,符竹庭和敌工部、武工队的领导反复研究,决定一方面利用我们的敌工关系,做伪职上层人物的工作,力争他们出面保释;另一方面组织伏击,争取抓获日方人员进行交换。符竹庭亲自将伏击俘敌的任务交给宋继柳和他的武工队。

宋继柳接受任务后,和其他武工队员化装成农民和渔民,日夜埋伏在日军讨伐频繁的新浦至青口的公路两侧,伺机俘敌。

功夫不负有心人,设伏没几天,朱乡长就送来一个情报:据新浦车行的内线关系报告,有一日本人租了辆黄包车,要从新浦去青口。接到情报后,宋继柳立即守候新浦到青口的必经之地——小东关村外的路口。

正午时分,一辆黄包车由南向北一溜小跑而来,车上斜躺着一个商人打扮的日本人,正眯着双眼在车上打瞌睡。宋继柳见状,迅速蹿上公路,拦住车子,一把揪住那人的胸口,二腰盒子早已顶上脑门。

宋继柳押着日本人顺着茂密的青纱帐迅速转送到教导2旅的驻地城头刘夫村。政委符竹庭亲自参加审讯,原来这日本人姓佐藤,军阶少佐,是以商人身份作掩护的日军情报官,我军获取了大量情报。几天后,由朱乡长做中间人,用佐藤换回了韩成林。宋继柳以他的机智勇敢,在赣榆抗日战场上演绎了一场脍炙人口的“走马换将”的传奇故事。

1942年冬,驻青口镇的日伪军侦知宋继柳和武工队夜宿范家店村,立即派了一个大队的人马把范家店包围起来,妄图围歼武工队。宋继柳为人十分警觉,偷袭的日伪军刚到村头,几百人走路的声音虽然很轻微,但还是被宋继柳超乎常人的听力发现了。他命令战友趁日伪军尚未合围迅速转移到村外,自己蹑手蹑脚,悄悄溜到村南路口,朝着日伪军扔了两颗手榴弹,打了一梭子,造成武工队向南突围的假象,然后迅速跑到村北,朝村北的日伪军也打了一梭子,扔了几颗手榴弹。趁日伪军晕头转

向的时候,他沿小巷迅速出村。这时,南北双方的日伪军都认为武工队朝自己的方向突围,机枪小炮一齐招呼,呐喊着向前进攻。打了半夜,才发现上当,自己人打了自己人。进到村内,搜到宋继柳他们宿营的祠堂大屋,早已人去楼空。

日伪军对宋继柳又恨又怕,总想早日除之。1942年春节期间,宋继柳回村探望家人,被盯梢的汉奸告密,青口的日伪军出动200多人把宋继柳的家围了个水泄不通,并且布下圈套,一心活捉宋继柳。

拂晓时分,宋继柳听到街上狗叫,觉得事情不妙,趴到墙头上向外探头一看,两挺歪把子机枪正对着自家大门口,巷子两头堵着上百名伪军。他闪身退回屋里,踩着桌子扯开了房顶的屋草,发现屋后也埋伏着人,正端着枪准备射击。宋继柳双手一使劲,钻出屋顶,朝兵力较弱的北面伪军一连甩出三颗手榴弹,然后一直向北跑,成功突围。

日伪军多次出击都没有抓到宋继柳和武工队,气急败坏之下把宋继柳的两个弟弟抓进青口据点,叫宋继柳“投案自首”,换回兄弟。宋继柳火了,当夜来到青口圩外,抬手一枪把挂在圩墙碉堡上的马灯打碎,高声喊道:“你们这些警仔子胆大包天,竟敢逮我兄弟!告诉你们,三天之内如果不把我兄弟放出来,我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看谁杀讨谁!”日伪军都吃宋继柳的苦头,知道宋继柳神出鬼没,防不胜防,无奈之下,只得通知伪保长把宋继柳的两个弟弟领回家。

新青公路是新浦与青口日伪军往来的唯一通道,也是日伪军重点保护的区域。沿途较大的村镇都建有碉堡和据点,巡逻队也日夜不停地沿路巡逻,以保障公路的畅通。1943年秋的一天上午,宋继柳挑着两口袋地瓜干,化装成赶集卖粮食的农民,顺着新青公路寻找“猎物”。当他走到太平庄时,发现一辆日军的汽车“趴窝”在公路上,两名伪军正拦截行人推车,宋继柳也被拦住,被迫和几名老乡帮着推车。宋继柳偷偷瞄一眼车上,四名日军正在打盹,毫无戒备。他飞身攀上车厢,顺手抽出手枪,打死两个日军,另一个日军军官惊醒了,拔出指挥刀劈了过来,宋继柳一个杨柳摆腰,侧身躲过,反手一枪正中日军脑门,又枪口一抬,打死剩下的一个



日军。那两个伪军早已吓软跪在地上,连声求饶。宋继柳一把火烧了汽车,押着俘虏回到了根据地。

1945年2月11日,春节临近,大沙村逢集,宋继柳率领4名武工队员身着便衣来到大沙,想教训一下敲诈勒索、作恶多端的日伪军,让老百姓讨个安稳年。在集上转了几圈,没碰到一个“猎物”,宋继柳来到一个剃头摊子上,一边刮脸,一边守株待兔。脸刚刮了一半,大沙村老乡便来报信说:“青口来了一伙二鬼子,抢粮抢菜,还抓了几个老百姓,叫拉着大车朝青口送。”宋继柳一听,脸也不刮了,拔腿就朝集上跑。一个不识好歹的伪军见宋继柳跑过来,一边晃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一边威胁宋继柳去拉大车。宋继柳顺手夺过步枪,把他踢了个仰面朝天,随后朝前面的伪军跑去。伪军班长见宋继柳剃了个半边脸,上面还沾着没洗净的肥皂沫,身着便衣,一手提着步枪,一手拎着把盒子炮,便大声问道:“哪部分的?”

宋继柳微微一笑,答道:“没外人,我是宋继柳!”那几个刚围过来的伪军一听,如雷贯耳,吓得不轻,双手举着枪,早都跪在地上投降了。宋继柳命令伪军解下绑腿,相互绑了起来,然后把13名伪军穿成一串,脖子上挂着没有枪栓的步枪,押回根据地。

驻青口的伪军保安总队奈何不了宋继柳,只好把气撒在老百姓的身上,向大沙村所在的第七区公所下令:限大沙村老百姓在三天内把人枪送到青口,否则就把第七区北5乡杀光、烧光。宋继柳闻讯,夜半用大喇叭筒向青口据点喊话:“人是我宋继柳逮的,和老百姓无关,如果你们非要向老百姓要人,我就把13颗人头给你们送来!”被俘的伪军家属生怕把宋继柳惹急了杀人,纷纷跑到伪保安总队找外号焦大刀的大队长焦传铭哀告:“千万别向宋继柳要人要枪了,宋继柳不好惹。”无奈之下,焦只好作罢。

宋继柳多次受到八路军115师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滨海军区政委兼中共滨海区委书记符竹庭和滨海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兼滨海地委书记谷牧等党政军领导人的接见和表彰。1945年7月7日,八路军战地记者阜东撰写的《勇斗宋继柳》一文,发表在滨海军区机关报——《民兵报》上,宋继

柳的战斗事迹传遍了滨海大地。1945年10月,滨海军区司令部授予宋继柳“独胆英雄”的光荣称号。1946年7月7日,山东解放军滨海军区政治部在编辑《滨海八年》一书时,《勇斗宋继柳》一文又被收录,从此,独胆英雄宋继柳的传奇故事永载史册。

身价最高的武工队员

1944年8月,日伪盘踞下的赣榆县城和青口、沙河、墩尚、朱堵、海头等集镇相继贴出悬赏布告:“活捉海赣独立团便衣武工队一人者,赏洋一万元,击伤一人者,赏洋五千元。”布告一出,舆论哗然,这布告上要捉拿的海赣独立团便衣武工队又是一支怎样的神武之师呢?

海赣独立团是赣榆土牛土长的地方武装,先后参加讨赣榆战役、半边店战斗、保卫海岸线和反“伪化”、反日伪“突击”等战役战斗,以机动灵活打击敌人著称,尤其是以齐玉发为队长的便衣武工队,更是战功卓著,令日伪闻风丧胆。

马厂,是紧邻赣榆县城的一个较大的村庄,也是县内最大的集贸市场。这天逢集,海赣独立团的便衣武工队长齐玉发和他的队员王维山、郭十俊、刘成有、朱峙俊在集市西头的狗肉摊子旁左右转悠。他们的目标是伪建国军71旅141团团长沙步仁手下第5连的一个连长,这个连长是我军的一个叛徒,自从随杨步仁叛变投敌后,经常化装成我军的便衣队窜到根据地暗杀我军政人员,危害很大。军区首长决定严惩叛徒,这个任务交给了齐玉发他们。齐玉发从打入敌人内部的敌工人员那儿得知,这个伪连长喜欢吃狗肉,每逢马厂大集,都会到狗肉摊子上敲诈几斤狗肉。武工队决定虎穴除奸,化装成赶集的老百姓,在马厂集上击毙这个为非作歹的伪连长。

正午时分,集上买卖最忙,那伪连长一路哼着小曲,出了县城西关,过了护城河吊桥,一个人奔向了狗肉摊子。这时齐玉发他们围着一个西瓜摊子,假装挑瓜买瓜,待那伪连长只身走近,齐玉发猛地窜上前去,右手一扬,“叭”地一枪,正中伪连长的脑门。枪声一响,集上炸了锅。齐玉发他们趁乱撤退,待日伪军大部队赶来时,马厂集上已经不见人影。

齐玉发带领便衣武工队经常深入日伪占领区,



召集伪区、乡、保长开会,交待政策,教育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并且在伪军政人员中开展记“红黑点”“善恶录”“生死簿”活动,公开处决罪大恶极的铁杆汉奸和伪区乡长。在我军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影响下,许多伪区、乡、保长思想动摇,或暗中替我军办事,做“白皮红心”两面人,或干脆辞职不干,逃往他乡,一时间,伪政权连个干区、乡长的人都找不到。

1944 年底,新上任的伪第一区区长依仗自己的区公所安设在离县城仅一里之遥的马厂街,手里又有几十名武装齐备的保丁,便胆大妄为,敲诈勒索,盘剥百姓。我军多次对其谈话教育,劝其改恶从善,他都置若罔闻,反而变本加厉,作恶多端。齐玉发他们经过精心准备,计划兵分三路,深入虎穴,活捉伪区长。

农历腊月初八,马厂大集。伪区公所的保丁,赶集的赶集,回家的回家,只剩两人站岗值班。齐玉发带着几个武工队员化妆成赶集的老百姓闯进伪区公所,两个站岗的保丁伸枪拦住去路,齐玉发掏出二楞盒子,不待开枪,一个保丁吓得扔枪就跑,边跑边嚷:“八路来了!八路来了!”武工队员们三下五除二就将两个保丁捆了个结结实实。

齐玉发他们搜遍了伪区公所的二楼院子大小几十个房间,都没找到伪区长。细心的齐玉发发现八仙卓子上茶杯里的茶水仍在冒着热气,一把磨得锃亮的水烟袋还端端正正地放在桌子上,一摸烟袋锅子,还是热的。齐玉发站在堂屋门口,四下一看,西堂屋门旁有一地瓜窝子。土生土长的齐玉发对当地的风俗习惯了如指掌,那时稍微殷实一点的老百姓家里都在朝阳的墙根挖个地瓜窝子,秋天窝地瓜,冬天窝萝卜白菜。大户人家更不用说,窝子不但挖的大,里面还能藏人藏金银财宝。

齐玉发暗示一武工队员抱来一捆稻草,点着了扔进地瓜窝子,两分钟不到,伪区长就被熏了出来,当了俘虏。驻城里的日伪军接报后,出动大批人马追了出来。刚出城门,就被齐玉发武工队第二小组打了回去。

1944 年秋,伪中央盐警海州分团团长贺德旺在伪 71 旅 141 团特务大队长赵虎臣的协助下,带领 20 多名伪军组成扩军组在敌占区阎庄一带扩

军招兵。贺德旺同时是日本特务严容组织的反动道会门——龙会盐榆总会的总会长,他们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强行拉丁,先是扬言:凡是参加盐警的壮丁,可以不出差,少交粮,少交捐。见老百姓无动于衷,没有上当受骗的,便强行加重派粮派款,赵虎臣的特务队还趁火打劫,到处烧杀抢掠,残害百姓。

一个漆黑的夜晚,齐玉发率领 20 多名武工队员,悄悄摸进贺德旺扩军组的驻地阎庄,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扩军组住的院子。齐玉发和赵国十、薛连荣、郭十俊等人叫开了门,假意投奔贺德旺。贺德旺和扩军组的刘承基喜出望外,让伪军搬来军装给大家换上。刘承基特意卖好地拿了一套有武装带的军官服装给齐玉发,这时其他武工队员也吵着要军官的衣服穿,齐玉发大声地说:“同志们,何必这样呢?”这其实是动手的暗号,话没说完,埋伏在院外的武工队员就冲了进来。片刻之间,贺德旺和他的伪中央税警团扩军组就在阎庄见了阎王。

小朱庄,位于新(浦)青(口)公路旁,大沙河畔,因军事位置重要,日伪在小朱庄建了炮楼,安了据点,驻有一个小队的伪军。小队长是县保安总队总队长焦大刀的亲信,为非作歹。我军早就想拔除小朱庄据点,为民除害,但小朱庄据点和周边墩尚、四沟、柳口、大沙等据点互成犄角,再加上这个伪军小队长为人十分狡猾机警,天一黑,任谁喊门,都不放吊桥,很难进入据点。

1944 年快过阳历年的一个傍晚,天刚黑,小朱庄据点外来了一行人,有男有女,炮楼上站岗的伪军大声喝问:“什么人?”

“媳妇回娘家,刚接回来。”行人答。

“天晚了,不放吊桥!”

“那俺这有男有女的,上哪过夜?老总行行好吧!”

伪军小队长这时也来到炮楼上,黑暗中见到吊桥外有个包着头巾、穿着花褂子的年轻女子,色心大起,忙说:“等等,我们先搜查一下,再放进来!”

吊桥慢慢地放下来,伪军小队长带了几个人嬉皮笑脸地走过来,这时天越来越黑,小队长想看



看女的脸,那女的假装害羞,一个劲地朝后退。离吊桥足够远时,扮成小媳妇的齐玉发猛一回头,开枪把小队长撂倒了。这时,其他同志的枪也响了,片刻之间,击毙了从据点里出来的几个伪军。等据点里大批伪军追出来时,武工队员早已消失。

日伪军对齐玉发和他的便衣武工队又恨又怕,曾十次伏击齐玉发,都未见到齐玉发的影子,只得发出悬赏布告。但便衣武工队依然活跃的赣榆城、青口、沙河、墩尚、罗阳周围,曾截击过敌军的车辆,火烧过伪军的盐槽。据不完全统计,在不到两个月的反伪军突击斗争中就击毙伪军13个,击伤20余个,俘获18个。

反战同盟 武工队里的日本战友

1942年12月,为反击日伪军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揭穿日军“大东亚圣战”的欺骗宣传,我军在军事上使用“翻边战术”,反“蚕食”、反“扫荡”,同时,加强政治攻势,加强敌军工作,教导2旅和赣榆县委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召开群众大会、十绅座谈会,散发宣传品,宣讲八路军开展的“红黑点”、“善恶录”、“生死簿”活动内容,利用各种关系在敌军内部发展内线关系,欢迎日伪军政人员弃暗投明。

在八路军武工队的保护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山东支部也派卜中、山中、本桥、正中川等人对赣榆县海头至白塔埠的三十多个日伪据点进行喊话,教育日军十兵不要为军部卖命。在武工队包围大官庄据点喊话时,鲁中支部代表卜中桐山冒雪到大官庄据点外40米处,用日语喊:“喂!日本十兵兄弟们!”日军以为是增援部队,赶紧答话,始知是反战同盟。日军中队长问:“你们是共产党吗?”卜中答:“不是,我们是在战斗中来到八路军的,我们认识了侵略战争的罪恶,为日本十兵和人民解放,举起了反战的旗帜。”日军接着问:“你们说,日本人不应该支持大东亚圣战吗?”卜中说:“是的,日本军部以十兵的生命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这就是大东亚圣战。”日本中队长哑然无语。卜中说:“兄弟们!你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退出战争,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第二条是继续参加战争,做无谓的牺牲。你们的父母儿女希望你们安全回国,不希望你们用生命换取勋章伴着白木箱(骨灰盒)回国啊!”事后,据

大官庄据点里投诚的伪军说,卜中喊话的当天,日军中队长枪毙了两名思乡哭泣的十兵,后来又有一名日军上吊自杀,一名逃亡。

1943年夏,为了加强滨海区对日军的反战斗争,反战同盟山东支部任命金野博为滨海支部支部长。在赣榆武工队的配合下,活动于赣榆、日照沿海一带。为了保护金野博的安全,武工队长于镜清建议他改为金野博。

金野博在武工队的配合下,首先争取了尚有爱国心的日照县傅疃河桥头据点的一名翻译反正,详细掌握了驻日照、赣榆一带日军的各方面情况,然后通过夜晚喊话,给日军打电话、写信、送宣传品、寄“慰问袋”、扎宣传棚等形式,开展反战工作。他从日本军阀在军内和国内的残暴,日军侵华暴行和日本军部的欺骗宣传,一直讲到日军必败的结局和八路军的俘虏政策,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号召日军十兵站到反战行列里来。经过几次喊话,日军十兵思想受到很大震动,思乡厌战,情绪低落。一名日军因思念家乡,在日照城东门楼上面对大海、面对日本方向上吊自杀。

反战同盟战友们对日本人的宣传教育,同时也教育了汉奸和伪军。当一名日军翻译得知金野博是反战盟员,忽地起立,向金野博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连声说:“惭愧!惭愧!你是日本人,帮助中国人抗日救国;我是中国人,却帮助日本打中国,我还算是人吗?”

金野博用他的实际行动,实现了他参加八路军时的誓言:“我们醒悟了,我们坚决站在革命立场上,为中日两国人民彻底解放,奋斗到底!”

抗日战争时期,赣榆县的武工队在主力部队的掩护下,经常深入敌占区,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召集群众开会,宣传胜利消息,揭露日伪暴行,动员抗粮抗捐,组织秘密民兵,建立保甲户和地下交通线。伪军官兵和伪政权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下,暗地里纷纷同我军拉关系,向我军递送情报,有的携枪向我军投降。武工队的广泛活动,开创了敌占区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赣榆区史志办)

责任编辑 于冰洁



鲜为人知的抗战书籍 《血战敌后的一一五师》

王晓华



《血战敌后的一一五师》封面

抗战时期，八路军第115师自奉中央军委命令入鲁作战以来，就十分重视舆论阵地的建设工作，出版报刊，翻印著作，编写教材，对弘扬民族精神，鼓舞军民斗志，指导全民抗战，瓦解敌人阵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宣传教育作用，有力指导了山东军民的对敌抗战。由115师政治部组织编写的《血战敌后的一一五师》，就是其中一本鲜为人知，影响较大的红色抗战书籍。

1941年冬，日军集结5万余兵力，分11路对沂蒙山区一带，实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以“铁壁合围”等作战手段，一举消灭山东分局、115师、山东纵队、省战工会等省直机关及所属八路军主力部队。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山东根据地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大“扫荡”。

在陈光、罗荣桓的领导指挥下，八路军115师与日伪展开了艰苦卓绝、史无前例，历时近两个月的反“扫荡”斗争，取得了收复蒋庄、诸满、大桥、马牧池、岸堤、河阳等地，消灭日伪军4000余人，攻克据点160余处的重大胜利。

但在此次反“扫荡”中，我根据地军民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八路军伤亡1400余人；群众被杀害3000余人、被抓10000余人；被抢走粮食80余万公斤。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115师敌工部副部长王立人等多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壮烈牺牲，省战工会副主任李潞之等一大批干部被俘，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部长李林等负重伤。鲁中根据地也被压缩一半。山东分局、115师、省战工会等机关被迫战略转移到滨海地区。山东敌后抗日形势由此进入到最困难时期。

反“扫荡”斗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蒙受重大损失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根据地军民的头上，抗战情绪也受到了极大影响。为鼓舞斗志，振奋士气，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1942年夏，经山东分局书记朱瑞



提议,要求115师政治部负责牵头组织人员,编著一本反映115师自整编出师以来,深入敌后对敌作战的战斗经过及所取得的重大战果的书,用铁的事实告诉广大指战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用英雄事迹,来激励鼓舞全山东军民不忘国耻、誓死抗战到底。同时,以此书来纪念抗战5周年和我党建军15周年。

朱瑞还对115师政治部主任肖华强调,编写此书意义重大,对鼓舞提振目前指战员们的低落情绪,克服眼前困难,激发全民奋起抗战热情,以争取更大的胜利,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和政治意义。

肖华受命后,召集由师政治部、宣传部、115师机关报《战十报》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编写书籍的问题。肖华在会上要求,要以文艺通讯的形式,用通俗易懂、易被普通战士阅读的语言加以编写,选题要有重点。会上,肖华还指定由《战十报》主编白刃负责文稿的统筹和编辑。

会后,大家按照分工,分头搜集写作素材,采访参与战斗的亲历者,最终编著成书。山东分局书记朱瑞还为此书起了《血战敌后的一一五师》的书名。

书中的内容以115师出师山东为节点,共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115师入鲁之前参与的战斗。有平型关大捷、广阳伏击战、汾离公路三战三捷、午城、井沟战斗等几篇;另一部分是115师挺进山东后,参加的经典战斗,有樊坝战斗、草桥“阅兵”、留田突围、陆房突围、梁山歼灭战等篇。赣榆县青口战役中涌现出来的“十八勇士”的英雄事迹也被编印其中。

收录此书的作品中,除《平型关大胜利》一文的作者萧向荣(抗战初期任八路军115师宣传部部长,开国中将)不在山东根据地外,其他作者如肖华、赖可可、康矛召、张秋桥、白刃、那狄等,当时都在滨海区西朱苑村工作。

书中,肖华撰写了《艰苦奋斗的五年》,康矛召撰写了《草桥阅兵》《樊坝战斗》《梁山歼灭战》,那狄撰写了《陆房突围》,白刃撰写了《广阳伏击战》和沂蒙反“扫荡”,即1941年冬日伪发动的历时近两个月的大“扫荡”。题目是由115师参谋长陈十架帮助

白刃拟定的,取名为《坚持沂蒙山区反五万日寇大“扫荡”战记》。此文再现了我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艰苦反“扫荡”的战斗经过。

书中的序言部分,由罗荣桓撰写。据白刃回忆:“编完书,我去请罗荣桓政委写篇序言,他高兴地答应,很快交了稿。序言短小精炼,文字轻松活泼,可惜我保存的书已丢失,只记得序文最后一句的大意是‘我军在敌后歼灭日寇的这些战斗,成为抗战胜利的嘹亮歌声。’”

好在白刃的遗憾尚能补缺,罗荣桓的这篇序言在历经战火的洗涤后,被有幸保存了下来,解放后,这篇序言被收录在《罗荣桓军事文选》一书中。序言不长,特录入如下:

《血战敌后的一一五师》序

(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

罗荣桓

抗战五周年来,我师由敌人正面进到翼侧,逐渐分散,深入敌人后方,展开了和坚持了广大的游击战争。

北起五台,南下江淮,西跨同蒲,东抵海滨,我师足迹可谓驰骋了华北,策应了华中。

千百次的战斗,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消耗、伤亡与损失。平型关首次挫败敌人锐气,这是久已深印在全国人民心坎中的信念,成为街头巷尾、偏僻乡村的嘹亮歌声。广阳、午城、井沟的连战皆胜,汾离公路的三战三捷,樊坝、梁山的诱围聚歼,泰西陆房的顽强突围,白彦、天宝山的反复争夺,抱犊岗、沂蒙山的粉碎“扫荡”,都显出我师英勇战绩,而且在晋冀鲁豫的辽阔平原上,创造了自己没有过的经验,由于我师这些成就,曾迫使着敌人不能自按地作出愚蠢的怒吼,要求我约定会战,要挟我退还重炮,用雪仇的口吻宣泄出士气的颓丧,但终于不能不承认我卓绝的战斗精神,而专门印发《对陈光部作战研究》,这是敌人感到难于忍受的痛苦和自供。

因此,毫不夸耀的编辑和介绍出一些片断的战斗通讯,记载我师抗战五周年来为国为民的忠诚,不屈不挠地杀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发挥英勇善战的传统,这是我们全师指战员的荣誉,并以此作



为献给我军诞生十五周年,纪念“八一”的礼物。

难能可贵的是,这本仅 130 页、32 开铅印本的红色抗战书籍,竟然配印了数十幅木刻作品,可谓图文并茂,相得益彰。木刻的作者分别是那狄、宋大可和韩涛。在这些木刻作品中,有 115 师师长林彪(林彪受伤后,仍担任该 115 师师长一职)、副师长聂荣臻、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肖华六位领导人的木刻肖像,囊括了 115 师一级所有军事领导人。这在抗战时期解放区出版的著作中是极其罕见的。



羅榮桓政委



陳士榘參謀長



蕭華主任

八路军第 115 师主要领导木刻画

特别是对罗荣桓而言,更是情况少见。罗荣桓一向行事低调,从不让人讲他的功绩是出了名的。白刃回忆:“罗荣桓政委在审阅《血战敌后的一一五师》一书样稿时,其中《巧妙的留田突围》一文中,本来如实地写下了罗政委分析敌情、提出任务和带队突围的情景,但罗荣桓同志看稿时却一笔抹掉了自己的名字。”

木刻作者之一的那狄,解放后也曾写过《不要

登我的头像》一文,深情回忆了罗荣桓的这一优秀品质:

抗战初期,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出版一种指导部队工作的《八路军军政杂志》,敌后根据地有的地区相继出版了类似的刊物。1941 年 115 师政治部也决定出版《战士月刊》。我的任务是将来总司令给《战士报》题写的“战士”二字描刻在木板上,固定为《战士月刊》封面,再就是刻些装饰画。

我们看到别的地区出版的杂志和画报,有的登着当地领导人的头像。罗荣桓同志是师政治委员,在全师享有崇高威信。我和陈虞榕同志商议,在《战士月刊》第一期的扉页上印上罗政委的头像。我们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那时印刷厂不能制铜版照片,便找到一张罗政委的照片,由我来刻成头像,拓印出来,同志们认为可用。稿件正准备送印刷厂时,宣传部领导同志转告了罗政委的意见:“不要登我的头像。”罗政委说:“我们部队由党中央、由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指挥,全军的报刊只应登他们的像。”

《血战敌后的一一五师》一书,于 1942 年 7 月 7 日出版发行。封面下面写有“十八集团军(八路军)115 师政治部出版”的字样,“编后”署“抗战五周年之际于黄海边”。书中《艰苦奋斗的五年》一文,从 1938 年写起,各章节的小标题分别为“在冀鲁边区”“在苏鲁豫皖地区”“在泰鲁西”“在鲁南”“在鲁中”“在晋西与晋西支队”,清晰地表明了 1938 至 1942 年期间,115 师主力活动区域。

《血战敌后的一一五师》虽说是为战时之需而编写的应时之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它的印刷质量也略显粗糙,但它是在抗日战争最为困难的 1942 年,出版发行于山东,而且此书的组织者、参与者、写作者,大多身居要位,又是这些战斗的亲历者、指挥者,所以,书中内容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是研究抗战时期山东军史、战史不可多得的一本珍贵文献。

(作者单位:东海县开发区北区南辰管委会)

责任编辑 于冰清



抗战时期的东海白河培训班

王宗富

中伏天气,我们走进东海县温泉镇的一座极为普通的院落,88岁的离休干部刘继明老人正坐在一张油漆已经斑驳的书桌前,戴着花镜,写一份讲稿。他说镇关工委要搞夏令营活动,叫他给留守孩子讲一段红色记忆。

我夸刘老的字写得工整。他笑了,说那是抗战时打下的基础。我惊讶于那时候他们村竟有学校,他说那时候叫培训班。刘老轻轻地拍着桌子,深情地向我们讲述那个烽火弥天的岁月。

刘继明老人回忆:

1942年春天,由海陵县抗日民主政府牵头,海陵县白河区抗日民主政府具体组织、安排的抗日积极分子培训班,在白河区(抗日战争时陇海铁路北的东海县域改称为海陵县,白河区包括现在的东海县双店镇、石榴街道、驼峰乡的大部分区域)驻地罗庄村正式开班,史称白河培训班。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苦的年头,日伪军多次疯狂地对海陵县根据地举行“扫荡”和“蚕食”。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式下,海陵县政府克服种种困难,为了鼓舞根据地广大干部的战斗士气,加强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提高广大农村抗日积极分子的素质,以基础条件较好的白河区为基地,举办了这个机会难得的培训班。

培训班共140多人,涵盖了全县大部分村子,一开始设4个班,即农教会班(以村级农教会的负责人为主)、妇教会班(以村级妇教会的负责人为主)、青教会班(以村级青教会的骨干为主)、民兵

班,后来根据县政府的意见,又增设了一个文艺班,为各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培养文艺骨干。

培训班实行军事化管理,统一休息,统一训练,轮流站岗,日夜巡逻,按班上课,分组讨论,分组活动。班长、组长都由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担任。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白河区的区指导员、区长,海陵县政府民政科科长、武装科科长、妇教会会长、农教会会长,还有抗日小学的十八位教员。抗大一分校文工团的几名骨干原来主要是抓文艺班的,后来也给其他各班开设抗战之声课,教唱抗日革命歌曲,教写美术字,指导如何画漫画……

办班不易,因而要求严格,无一人迟到或旷课;机会来之不易,大家更加刻苦学习,夜以继日。

培训班的课程结合实际,生动活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政治课的内容有为什么要减租减息,为什么要创建抗日革命根据地,为什么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音乐课,教唱了在当时颇为流行的几十首抗日革命歌曲,既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黄河大合唱》等,也有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自己创作的歌曲,有《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八路军》《沐河上的歌声》《月亮一出照楼梢》等。识字课除教农村常用字之外,还和抗日战争融为一体,如教“人,中国人,你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他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都要救中国,一致抗战打日本!”“平型关,打胜仗,八路军,威名扬,全国人民来慰问,日本鬼子心胆慌。秋后的蚂蚱长不了,男女老少打豺狼……”抗战地理课多是请部队的同



志袖空来讲的,有一次讲到东北大好河山已经沦陷敌手,讲到美丽的北平、“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广阔而肥沃的华北大平原惨遭日军铁蹄蹂躏时,教员悲愤难抑,竟当着全体学员泪流满面,全班学生不约而同地振臂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誓死不当亡国奴!”

民族气节课也属于政治课,是由一位家住海州一带名叫崔辅州的老师讲的,崔也是培训班的校长。他讲苏武牧羊、杨家将、岳飞抗金、文天祥……都是一个个悲壮感人的历史故事,所以格外动人,以致下课了,大家还是沉浸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氛围里,不让崔老师走,一次次鼓掌,叫他再讲一个。听同学们讲,崔老师后来加入了八路军,以他的特长,在部队里长期抓宣传工作。

我那年 16 岁,也有幸参加了这个培训班,编在民兵班里,后又转入文艺班。白河区的指导员对我说,这次叫你参加培训班,是因为你在村里带动、组织儿童团员站岗、放哨很出色,很受群众欢迎。因而你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学习,多学点本事。

培训班的最大特点是经常组织学员以小组为单位到各个村里去开展活动。搞减租减息的村子更是非常去,听“双减”队员给我们讲“双减”的意义,讲“双减”运动中遇到的阻力,讲“双减”运动为什么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积极性。由于身临其境,所以感受深刻,思想上提高很快。有位村里的农教会骨干对我说:“小同志,从‘双减’后吃到第一顿饱饭的那一刻开始,我第一次感受到共产党是为贫苦大众办事的,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翻身做主人的价值,第一次体会到庄稼人在农村中的地位。庄稼人的事也要庄稼人自己来管,庄稼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这些活动不但使我开阔了眼界,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了抗日战争,还使我坚定了要为这一神圣事业奉献自己的决心。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印象深刻。有次白天,我和另外两位学员在罗庄村南面 3 里外的一处路口站岗时,发现有两个人各挑着一担东西朝村里走来,他们走走停停,还时不时地朝路两边瞅瞅。到我们所在的路口时,我们叫他们停下,他们放下担子,神色有些慌乱,又是敬烟,又是递火,净说好话。我仔

细地看了看他们的手,不像是买卖人手,又看了看他们的肩头,常挑着担子的人,肩头一般都会被扁担磨得发亮或有破绽,但他们的肩头一点样子都没有变。他们挑的是虾皮,我装作要去拿筐里的虾皮尝尝,这可把他们吓坏了,他们一齐在前面拦着我,其中一个结结巴巴地说“八路先生,我们是小本生意,你要吃,我亲自给您装十几袋。”我料定其中有诈,退后一步,打了个手势,示意另外两位学员看住他们。我快步走到虾皮筐子跟前,出乎他们意料地伸手朝里一摸,分别抓出了一把匣子枪。那两个家伙没想到会露馅,一时慌了神,便急忙要往路旁的树丛里钻。到网里猎物哪能容他再飞了,我把枪一点,高声喊道:“再跑一步,就打死你们!”他们乖乖地举起了双手,在罗庄村培训班的办公室里(是一大户人家的祠堂),这两个家伙哆哆嗦嗦地交代了来刺探培训班情报的事实。他们是石湖村日军据点的,想摸清培训班的情况后,引导鬼子、伪军夜间来偷袭。为这件事,我有了点名气,培训班专门在全校大会上表扬了我们 3 人,说我们在培训班里进步很快,警惕性高。海陵县政府的领导还专门到培训班看望我们 3 人,夸我小小年纪,机灵有胆量,点子不少。

根据我们的建议,为了安全,培训班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转移了 3 个地方。

培训班结束后,学员们又重新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有的成了基层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有的加入了八路军 115 师的老四团,有的又被推荐到滨海区兴办的沐海中学去学习,有的后来成了支前模范,有的成了战斗英雄,有的随大军渡江南下,开辟新解放区,当上了县长、市长……青春的火花在民族自卫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洪涛巨浪中闪闪发光,战斗的乐章在历史的大潮中奏出时代的最强音!

(根据离休干部刘继明口述整理)

责任编辑 于冰清



抗战时期赣榆县流通的货币

祝新华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反动势力除采取武装侵略杀我同胞、毁我财产、占我领土,还通过伪造货币等卑劣的手段扰乱金融、阻碍生产、破坏经济。我根据地军民针锋相对,进行了有力的坚决反击。今年 9 月适值我国抗战胜利 70 周年,笔者特就这一时期隶属山东滨海区的赣榆县境内主要流通的货币谈点粗浅的认识,以表纪念。

卢沟桥事变前的一两年,赣榆县境内主要以国民政府“四大行”,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流通主币,统称“法币”。

1937 年后,沿海大城市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有通货发行权的四大银行的分支机构多撤至大后方。这时市场上一方面通货不足,不少商号自印门头字号票在附近集市流通,票面额多为 2 角、1 角、5 分、4 分,集满 1 元可以到出票字号兑换法币 1 元。另一方面法币越来越破旧,但又无法兑换新币,群众对法币的信用度持续下降,社会拒用旧法币之风频起。一些最破旧的法币最后出路只能是完粮纳税,政府收入后又把它作为薪资发给军警,这样恶性循环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

要说当地自行印制土票,还要追溯到抗战前的 1935 年。赣榆县各商号、摊贩先后自制“门头票”,俗称小票、乡票、土票等,作为法币的辅币,发行数量多达数百种,总额达 2.4 万元。县城附近的马厂集“恒茂”染坊发行的门头票信誉最高,有“四大银行不如恒茂染坊”之誉,曾流通赣榆全县和郯城、临沂、莒县、日照等县。到 1936 年底,江苏省政府下令取缔“杂票”,赣榆收回门头票 1.6 万元。数月风头过后,门头票又恢复流通。1941 年,赣榆县抗日民主政府命令取缔“杂票”,根据地各区停止使用门头票,日伪军侵占区仍继续流通,直至抗战胜利。

1939 年 2 月 27 日,日军以第 5 师团的半个大队、炮兵 1 个中队的兵力侵入赣榆,占领了青口、沙河、三洋港、城里,县境相继沦陷。日军在占领区强制使用日本国“军用票”,后以伪华北联合银行货币“银联券”陆续换回。到 1943 年后,县境日伪占领区又主要流通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货币——“中储券”,1945



朱爱周签名的赣榆县田赋流通券



年9月停止流通。

1939年,国民党赣榆县爱国县长朱爱周率部撤至县境西北部山区坚持开展游击战争。此时旧法币的问题更加突出,他采纳部下仿效商号店铺印制门头字号票在市面流通的建议,决定印制代用钞,并明确要求实施专管组织的监督,切实控制发行数量,严禁滥发伪造,确保政府信誉。很快便成立了以朱爱周、张树仁、王秀三、徐达人等为主要成员的“赣榆县地方财务监理委员会”(简称“监委会”),相当于地方银行的金融组织机构,负责统筹全县粮税事宜,5月,即在莒南县大官庄发行了以田赋作抵押的代用钞——赣榆县田赋流通券(见下页图)。

流通券有1元、5角、2角等几种面值,且其版式不一。其中,1元券就有多种版式,有正面5个“寿”版(四角各加1个正中“寿元”或偏左“寿元”)、6个“寿”版(四角各加1个、中心2个“寿元”)等。如1940年印制的1元流通券,长13.4厘米、宽6.9厘米,咖啡色或深红色正面。票面中上方印有手写体“赣榆县田赋流通券”,其左右各盖蓝色编号,下方左右各印黑色英文签名;中间为花纹密拥的票面额大写“壹元”,四角有大写四个“寿”字,两侧是“完粮纳税、一律通用”八个字样;背面为淡绿色,印有朱爱周署写的黑色行书签名,加盖有“赣榆县长”和“赣榆县地方财务监理委员会”的方形印章。流通券印好点数统计后,交县地方财务监理委员会,负责收理的是原2区区长滕延年,由他领人加盖印章,一是“赣榆县长”小关防铜印,一是现刻制的牛角篆体文“赣榆县地方财务监理委员会”方形印章。流通券上的码号为当时手工加盖。流通券除完粮纳税外,持券者可以随时到本县各税务段兑换法币。以后又陆续印制5角券、2角券两种,2角券背面为红色、5角券背面为深绿色,田赋流通券在莒南和县境内流通,深受欢迎。其总发行量约30万元,这在抗战期间对提高法币信用,抵制伪币渗入起了一定作用。

在抗日根据地,讨分破旧的法币经税收回收后,不再在市面流通。沦陷区敌伪推行的

伪钞只能在敌人占据的旧县城及青口等地流通。当时,赣榆县政府自设海关,接管盐税,财政收入逐渐充足,法币收入超过了流通券的发行额,流通券实际上代替了流通货币,起到了抗日根据地钞票的作用。

1940年3月朱爱周殉国后,流通券一度停止发行,并由地方政府财务管理委员会发出通告,组织以法币与田赋流通券等值交换收回销毁。可继任县长董毓珮上任后,重新发行“赣榆县田赋流通券”30万元。1941年,赣榆县抗日民主政府禁止使用。

1942年初,伪县政府开始大量伪造法币、土钞,倾入我根据地,并高价抢购耕牛。是年秋,滨海专署成立了北海银行滨海分行,随后,北海银行赣榆县办事处成立,孙武任主任,受滨海分行和赣榆县抗日民主政府双重领导,确立北海币为本币单位。8月1日开始,根据地便实行独立的金融体系,直到1949年2月停止使用。

虽然民主政府严禁伪币流通,但在根据地的民间集市仍有一定伪币流通,日伪军侵占区也有许多北海币流通。那么,伪币兑北海币是按照什么比值兑换的呢?笔者这里仅以一组数字说明:1943年7月时是8.0:1,1944年1月时是1.5:1,1944年6月时是1.1:1,1944年12月时是0.16:1,1945年1月时是0.15:1,1945年8月时是0.03:1。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根据地与日伪侵占区物价指数的对比,如果用北海币对伪币来表示的话:1944年1月时是100:100,1944年6月时是110:144,1944年12月时是102:603,1945年1月时是98:914,1945年8月时是127:4570。

(作者单位:赣榆区政协)

责任编辑 于冰清



根据地北海银行发行的“北海币”



七十多年前的 一场屠杀

张骏鹏 常锦岗

这场血腥的屠杀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今年适逢抗战胜利 70 周年，海州石棚山的老人对这场屠杀仍然记忆犹新。

据老人们讲，大概是 1943 年晚秋前后的一天午后，赣榆墩尚沙河（含北乡）一带的 25 名同胞，被五花大绑，连串成单行，趑趄着走向石棚山，有近 10 个日军端着明晃晃刺刀押解，还跟着两条狼狗。当时靠山根的王庄死一样的寂静，庄头谢家很厉害的大黑狗，从庄北南来的一伙子人中，敏锐地捕捉到一股不祥之势，早早藏起来了。25 名同胞是驻新浦的索兵队前些日子去八路驻地扫荡逮捕来的，据说里面除了老百姓外，还有八路军。

经过王庄时，日军从庄中王新寿家门口掠去一只水桶，准备行刑前后洗刷刺刀。日军押着 25 名同胞到庄南边石棚山根西北大土洞沟崖头停下。凶残的日军用刺刀强迫 25 人分开成几批次，面向东大土洞沟谷站立。毫无人性的日军吼叫着轮番刺杀，我 25 同胞先后倒入沟底，25 具尸体摆在一起。

傍晚，日军不敢停留，草草收兵回新浦。胆大些的王庄人来到现场，发现死人堆里有人在呻吟，还

有救，胆大的两三人下去把尚有呼吸的拖拽到崖头顶上，后由庄上王新钺派人救治，连夜交给王庄西谢家小楼附近某庄上崔小来家（听说这人是崔家亲戚，姓朱，时穿破旧衣裳。崔家没什么人，只知一老人叫崔小来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病故），到崔家不长时间转回赣榆。

再说死人堆里还有 24 具尸体，当时王新钺指派朱学武、谢兆连一班青壮年把 24 具尸体搬运到王庄东北边荒野乱坑掩埋了。

那年头，海州在日军残酷统治下，石棚山王庄人面对日军的屠杀事件，有两种心态：一是不敢讨问，怕受连累；二是盼八路军、武工队打过来。

近年，王庄七八十岁老人常谈起山根大土洞沟“25”的事（当年屠杀后相当长时间，直到现在，老人们称该处叫“25”，成专用名词了）。当年原住王庄的尚能隐约记得这屠杀事件的老人（当年，他们中最大的八九岁）已为数寥寥，他们常念叨：无论如何，有牛之年还要提供线索，帮助查找 25 位同胞后人，我们对他们后人应负责，要有个交代。

今年适逢抗战胜利 70 周年，这场屠杀也渐渐





赣榆塔山大林头村惨案纪念碑

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铭记历史,面向未来,让悲剧不再重演,希望相关部门能在石棚山25位同胞遇难的地方立碑纪念!

最近与党史部门的人交流,这场屠杀可能与赣榆塔山大林头村惨案有关。

据介绍,抗战期间,赣榆县塔山镇大林头村曾发生过一次日军屠杀抗日军民的惨案。这次惨案发生于1943年12月22日(农历十一月二十六)。当天凌晨4点多钟,驻城里的日伪军200多人趁大雾,包围了大林头村。日伪军一边开枪,一边放火,抢夺财物,整个村庄火光冲天。5点钟左右,日伪军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并在村东头的打麦场上架起机枪,把抓到的群众赶到场上,逼问有没有八路,有没有共产党。丧心病狂的日伪军先后用刺刀捅死了刘立命、刘立美等4名群众。中共玉河区委派来的柳林挺身而出,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日伪如获至宝,押着柳林和几十名群众连同抢掠的物资返回城里。后柳林和大林头村的群众被押送海州,几十名群众被

害于海州山下。柳林被送伪反省院,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获新生。日军血洗大林头村,共杀害警卫员小顾和无辜群众几十人,年龄最大的50多岁,最小的仅15岁,大部分是青壮年。烧毁房屋160多间,全村几乎没有一间可住人的房子。抢走猪、牛、粮食无数,全村一片废墟,幸免于难的仅有老幼妇孺,史称“大林头村惨案”。

1995年6月,中共赣榆县委、县人民政府将“大林头村惨案”纪念地定为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立碑纪念。

赣榆大林头村惨案与海州石棚山的这次屠杀到底是不是同一次事件,相信随着相关调查研究的深入,谜底即将揭开。我们也希望有知情者能向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

(作者为海州石棚山原住居民)

责任编辑 于冰清



云台上的丰碑

——抗日石刻与连云港保卫战(下)

李 彬

(接上期)

五、国民革命军第57军

(一)国民革命军第57军沿革

国民革命军第57军前身是张学良东北军旧部,在东北易帜后改编而成。这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1933年曾在长城抗战中与日本混成第33旅团激战。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被缩编,第57军辖第111师、第112师,由缪激流任军长,移驻苏北淮阴。1938年2月,日军勾结土匪张宗元、刘桂堂侵犯赣榆、安东卫,企图进一步占领海州。由于战局的需要,守卫连云港的第40军疲弱部移师莒县,第57军也移师北上,第111师常恩多部驻守临沂、日照一带,第112师霍守义部则驻海州、连云港一带,以接替第40军的防务。1938年10月,57军赴武汉参战,行至合肥,由于武汉失守,又退回苏北。1940年9月,军长缪激流派人至东海县桃林镇与投敌的原57军副官李亚藩勾结,欲与日军互订不侵犯协议,万毅与师长常恩多发动“九·二二”锄奸运动,缪激流仓皇逃跑,蒋介石乘机将缪激流免职,撤销57军编制,所部均归属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指挥。

(二)国民革命军第57军保卫连云港

1938年2月,第57军移驻海州。该部与中共在西安事变前多有接触,中共地下人员80余人亦由徐州乘车赴海州,打入第57军内部万毅团,宣传爱国思想,激发了广大官兵的斗志。3月间,第57

军667团团长万毅经谷牧、张文海的介绍,在新浦陇海公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4月22日,第57军334旅马万珍部奉命由海州出发,开往赣榆北境,清剿与日军勾结之张宗元、刘桂堂匪部。张刘匪部原驻诸城、日照,3月日军令其沿海岸南下,4月间从赣榆县柘汪登陆,然后,迂回到日照的碑廓、巨峰一带骚扰,以影响连云港一带的安全,伺机侵犯海州。4月23日,马万珍部进攻傅官庄、碑廓,5月1日进攻侵犯柘汪的匪军,一举击溃匪军。5月2日,对强占碑廓镇的刘桂堂发起进攻。刘桂堂部所在地,有一道建筑坚固3丈高的砖围墙,第667团团团长万毅命令山炮连轰垮围墙。这个山炮连,是东北军的老家底,军官都在东北讲武堂炮兵队学习过,士兵也经过训练。接到命令后,山炮连将大炮对准围墙,轰!轰!轰!炮响过后,围墙轰然倒下。炮声还未平静,团长万毅便带领步兵发起冲锋,伪军不支,匪首刘桂堂只带少数人逃窜。碑廓镇战斗刚结束,3日,团长万毅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地打响了涛雒战斗。涛雒战斗遇到的阻力与碑廓相似,万毅便如法炮制,先轰几十炮,然后步兵冲击,骑兵四面堵剿,占领涛雒,半天多时间结束战斗,彻底摧毁匪军侵犯海州的企图。667团首战告捷,全团官兵士气大振。

5月20日,日军恃火力强大,强行登陆连云港,与游击第8军在孙家山一带对峙。经激战,驻守云台山的游击第8军损失惨重,退守大桅尖高地。5



月22日,从赣榆柘汪赶来的第334旅奉命填防云台山,667团驻守孙家山,团长万毅命令士兵在山下修筑野战工事,严阵以待。

孙家山也称洞山,东为马腰、荷花街,西为庙岭,形成一个半圆形海湾,地势险要,战略地位突出,667团所辖的3个营分别把守3个制高点。第1营调防来到时,尚无坚固的阵地,全营官兵就一同行动起来,用洋镐、铁锹等工具挖了一个个野战工事。第2营、第3营都控制住各自的阵地,严阵以待。6月18日,天刚蒙蒙亮,海面上尚有雾气笼罩着,哨兵观察到近处海面上有舰艇在向岸边移动。团长万毅接到报告后,命令大家按原作战计划投入到战斗前的准备。不一会,日军的几艘小汽艇急速向岸边驶来。日军见没有什么动静,从汽艇上跳上岸,向孙家山上爬来。此时,海面上飞来几架日机,直向守军山坡阵地俯冲投弹,日军登陆队更加大胆地往上冲。667团担负着正面狙击的第1营士兵不顾日机的轰炸,向日军猛烈射击。日军一再往上冲,每次都被他们压下去。抗击中好多战士牺牲了,团部决定把预备队接上去打,增加抗击的力量。敌我双方反复交火,一直持续到傍晚,667团始终固守阵地。

黄昏,日军采取了守势,不再进攻。天黑以后,667团决定由第3营夜袭。他们悄悄地钻进了敌营,在暗中见到了日军,就扔出手榴弹,拼上刺刀。日军毫无防备,措手不及,有的仓皇夺路逃下了海,有的被炸得血肉横飞,有的被刺刀刺中倒下,这场肉搏战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拂晓。这次日军乘汽艇登岸的是一个中队,有100多人,经一昼夜的激战,被歼灭了近40人,其余的逃回了舰艇。第3营的勇士们在这次搏击中牺牲了6人,日军终被赶下海,667团官兵取得了反突击的胜利。此后,好长一段时间,日军再未敢登陆。

孙家山肉搏战之后,日军又多次企图从庙岭、西墅、塘沟、黄窝等地登陆,均被打退。7月8日,日军以军舰5艘,载陆军100多人换乘汽艇20多艘,在舰炮、航空火力掩护下,从塘沟海头湾登陆。第57军112师一部前出反击,给日军重大杀伤,

毁汽艇2艘,日军被击退,取得塘沟反击战的胜利。

7月17日,由112师668团崔锡璋部防守前沿阵地,667团万毅部奉命作为二线增援部队。日军300多人分乘舰艇沿孙家山、塘沟沿岸又一次强行登陆。日军天上有飞机对阵地进行疯狂扫射,海中的炮艇向阵地上不断地炮击,日军的登陆部队与守军展开激战。在密集的步枪、机枪、手榴弹的爆炸声中,冲锋号响,668团的战士们个个奋不顾身用大刀和刺刀向日军杀去。不一会儿,667团驰援前线,在陶庵乱石头的五条沟内与日军相遇,展开了肉搏战。日军逃到海边,667团官兵乘胜追击,日军被砍死在海水中,死伤20人,活捉3人,守军伤亡10多人。这次战斗将日军再一次赶到海里去。

8月初,667团退出阵地休整,由668团崔锡璋部与672团白喜禄部坚守阵地。8月2日,日军再次出动飞机、舰艇,轮番向守军阵地轰炸,掩护登陆的部队进攻连云港,经过一天的苦战,672团大桅尖阵地失守。大桅尖为连云港制高点,一旦落入日军手里,将导致整个战局的败势。危急时刻,万毅立即与672团团长白喜禄取得联系,万毅率领667团向日军右翼发动猛烈攻势,日军畏惧夜战,改变策略,固守不出,准备第二天再战。是夜三点钟,672团从正面攻击,667团从日军侧后,用强火力猛攻日军后背,日军两面受攻,夺路而逃,112师获得了大桅尖保卫战的全胜。

9月6日,孙家山登陆日军五百余名,向老窑守军阵地进攻,遭到重击,未能得逞,双方各据山隘,激战竟日。9月8日,日军五百余人在炮火掩护下再次进攻老窑阵地,与守军在山间激战。9月10日,日军向塘沟乱石头阵地进攻,以军舰大炮向云台山各高地密集轰击,守军沉着应战,奋勇击退日军。9月13日,日军海陆空联合再次向云台山阵地猛攻,双方在乌龙沟、大桅尖阵地展开血战,日舰集中炮火轮番轰炸,炸毁工事,守军伤亡惨重。9月14日,日舰4艘从孙家山一带向守军阵地发炮射击,日汽艇十余艘,自平山岛出发,强行登陆,进攻守军侧翼阵地,激战数小时,各有伤亡。同日,日机轰炸东海、灌云、新浦,投弹多枚,炸死平民数十人,炸毁





周从权题刻

民房百余间。9月17日晨,日军陆海空联合向乱石头阵地猛烈进攻,孙家山、陶庵的日军在海军空军炮火掩护下乘势进攻,守军奋勇抵抗,苦战三小时,阵地悉被日军摧毁,伤亡惨重。9月18日拂晓,第33师加入战斗,再施总攻,士气高涨,前仆后继,乱石头、五道沟、大龙顶、丫髻山一带原有阵地,悉数收复。日军遭受重创,溃尸遍野,残部仓皇退守孙家山。

此战后,第57军奉命参加武汉保卫战,连云港的防务交第89军33师贾福山部。

(三)第57军抗日题刻

1、周从权诗刻

位于宿城乡围屏山南坡一个招岸下,楷书。

正文:云台山顶雾苍茫,此是抗日大战场。百日争夺暂归去,可恨倭儿未斩光。

落款:一九三八年八月,沈阳周从权题。

周从权,生卒不详,从石刻落款上得知作者系辽宁沈阳人。周从权为57军一名团以下级别军官。

2、追悼全国抗战周年殉难先烈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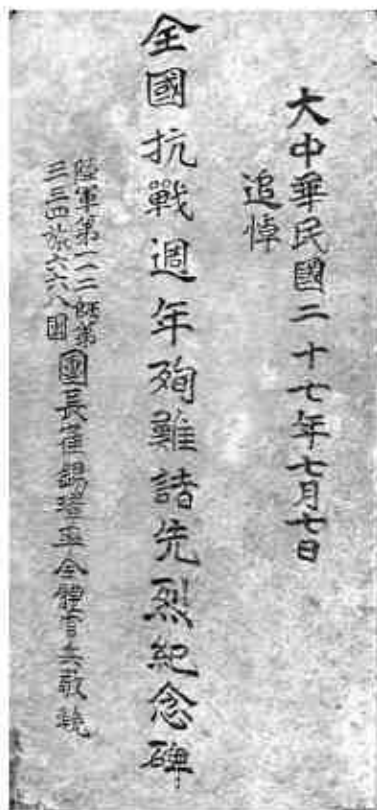
该纪念碑原位于连云港开发区朝阳办事处新县娘娘庙前,是为纪念抗战一年来牺牲的烈士们所立。纪念碑碑文为:

上款:大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七日

正文:追悼全国抗战周年殉难先烈纪念碑。

落款:陆军第一一二师第三三四旅六六八团团长崔锡璋率全体官兵敬挽。

1938年7月7日,668团团长崔锡璋在新县



朝阳抗战周年纪念碑



小学操场举行“抗日战争周年纪念大会”，追悼前方牺牲将士，会场贴满挽联。纪念大会后，在新县娘娘庙门前路边树纪念碑一通。日军占领连云港地区后，将此碑推倒，埋于稻田中。抗战胜利后被重新竖起，现藏于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崔锡璋，第 112 师 668 团团长。在连云港保卫战中，该团作为预备队，于七月间替换 667 团，守卫云台山。所部经中共地下党员的宣传，士气旺盛，战斗力大为增强。在大桅尖保卫战中，与 672 团合作，共同取得了大桅尖保卫战的胜利。

六、国民革命军第 89 军

(一)第 89 军沿革

第 89 军于 1938 年 2 月由江苏省保安团和警察队编成，韩德勤任军长，李守维任副军长。辖第 33 师（贾锡山）、第 117 师（李守维）两师。1938 年 9 月，第 57 军撤往武汉，第 89 军接任连云港的防务。1939 年 2 月，撤守连云港，驻守在苏北、苏中一带。1940 年 10 月，该军进攻黄桥的新四军，军长李守维兵败溺毙。

(二)第 89 军连云港保卫战概况

1938 年 9 月 18 日，第 57 军奉命参加武汉保卫战，第 89 军 33 师接防云台山的守卫之责。

9 月 19 日晨，33 师即向孙家山日军发起进攻，经激战相持至 20 日。9 月 21 日，旗台山之日军向乌龙沟发炮 20 余发，并以轻机枪掩护，步兵数十名乘势进攻，并向墟沟车站、连云市政筹备处一带发炮 60 余发，毁民房数十栋。9 月 22 日，守军奋力反击，收复全部阵地，日军退守孙家山，负隅顽抗。西连岛的日军，屡谋窜扰，也被击退。同日，日军焚毁东南高庄、刘李庄、赵圩民房，杀害无辜农民百余人。9 月 23 日午，日机 5 架向 33 师阵地投弹 200 余枚，藉焰火掩护，屡图进攻，均被 33 师击退。9 月 26 日，日机飞临墟沟上空，投弹 12 枚，日舰向 33 师阵地发弹百余发，日军步兵乘势进攻，被 33 师击退。9 月 30 日，日军再次向乌龙沟、大桅尖、大龙顶阵地施放烟幕弹，企图偷袭，再被 33 师击退。同时日舰向墟沟围屏山、门廉山（位于今陶庵一带）一带阵地发炮四五十发，日机 3 架在空中助战，33 师沉

着应战，击退日军进攻。

10 月 12 日，日军海陆空联合进攻云台山阵地，33 师官兵在乌龙沟、大桅尖各高地与日军展开血战，激战三昼夜。10 月中旬，日军以步兵六七百人，由老窑分路向大桅尖、乌龙沟、丫髻山、大龙顶各阵地猛扑，日机 7 架轮番轰炸阵地，均告失败。

1939 年 1 月初，连云港雪雨连绵，驻法起寺日军夜袭 89 军，并将夏庄民房全部焚毁，复向大板腺、扒山头各处进攻，被守军奋勇击退。1 月 4 日，日军海陆空进攻北云台山西部地区，与 89 军一部激战，至 5 日晨，日军又增加一部，穿过北云台山麓，向守军攻击，守军冒雪抗敌，毙日军数十名。1 月 26 日前双方始终相持在孙家山。

1939 年 2 月 25 日，日本第 5 师团一部由青岛海运至安东卫登陆，2 月 27 日占领赣榆。另一路由临沂沿公路向海州进发，于 3 月 3 日占领沙河镇。西路 21 师团之中岛部队，越讨运河，占领炮车、新安镇（今新沂市）、阿湖。与平野部队沿陇海线进攻大浦，第 5 师团之 21 联队则于 2 月 27 日由青岛海运至灌河口，3 月 1 日沿河溯航，在响水口与新安镇（今属灌南）一带登陆，3 月 2 日占领大伊山，3 月 4 日晨占领灌云县治板浦，同日午占领海属地区的政治中心海州。连云港守军腹背受敌，被迫撤出云台山区，转战于乡间，长达一年之久的连云港保卫战至此结束。

抗日战争期间，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用血肉筑成了我们新的长城。这期间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作为抗战主战场的国民党正面战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连云港保卫战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重要一环，遗留在云台山区的大量抗日石刻就是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和中华儿女众志成城精诚御侮的历史见证。

（作者单位：港口集团）

责任编辑 于冰洁



连云港抗战大事记(四)

(1942.1——1942.12)

本刊编辑部

1942 年

1 月

6 日,滨海大队攻克灌云县张湾附近的日军宋庄据点。叛徒、国民党灌三区区长宋沛然被击毙。

赣榆县交通站改为战时邮局,首任局长徐志坚,继任局长李浩然,直属县委领导。

2 月

3 日,八路军第 115 师师部从临沭胡子村迁驻赣榆县吴山区大树村。27 日移驻城头北之刘福村。自此至抗战胜利,皆流动于赣榆、临沭、莒南 3 县边区。

沐海中学在临沭朱樊村(今属东海县)创建,朱明远兼校长,邰华民任副校长。

3 月

伪兴亚军第 10 旅改编为沐海歼灭共游击队,蒋作斌自任司令。中共东灌沭县委敌工部对该部特务营营长孙祥绍做争取工作。孙祥绍与第 1 团团长孟少香、第 2 团团长张兆香于 1 日晚打死蒋作斌,率部归附抗日部队。伪兴亚军彻底瓦解。

驻海陵县桃林日军,将推盐的 20 多人活活烧死。

八路军第 115 师师部由赣榆县刘福村移驻临沭县朱樊村(今属东海县)。

29 日,中共华中局撤销淮海区专员公署,成立淮海区行政公署,李一氓任主任。下辖泗沭、沭阳、淮阴、宿迁、涟水、东海、东灌沭、沭宿海和宿北等县。

29 日,新四军第 8 师第 10 旅第 29 团配合地方武装在李小圩击溃徐继泰部主力,毙俘 170 余人。

赣榆县、区先后建立青救会、妇救会、农救会、职工救国会组织。

伪李亚藩旅改编为伪和平救国军第 36 师第

71 旅,下辖 141、142、143 团。

4 月

月初,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受中央委派,专程去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 115 师驻地临沭县朱樊村(现属东海县),处理山东抗战亟需解决的问题。

中共山东分局决定鲁中区五地委(即滨海区),与鲁南区四地委(亦称沐海区)合并为滨海地委,归山东分局直接领导。4 月 1 日,滨海地委正式成立,王众音任书记。地委下辖日照、莒南、莒中、沭水、赣榆、海陵、临沭 7 个县委和莒北、日北、马陵 3 个工委。与地委同级的行政机构为滨海专署,谢辉任专员。同时成立滨海军分区,何以祥任司令员,王叙坤任政治委员。

16 日,刘少奇在中共山东分局委员座谈会上作重要指示。25 日至 29 日,刘少奇在临沭县朱樊村(今属东海县)召开的山东分局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山东工作》《群众运动问题》等重要报告。

26 日,淮海行署公布二五减租法令,决定从当年夏季开始实行。

5 月

12 日拂晓,日伪军 1000 多人携轻重武器进攻灌云一区大拐圩。该区自卫队配合新四军 3 师 10 旅 29 团及滨海大队一部,奋起还击。战斗历时 3 天 3 夜,俘敌 200 多名,打死打伤 180 多人。

12 日夜,滨海区八路军配合抗协自卫军、海陵县大队及民兵,围剿马陵山一带匪穴,击溃许兰牛的五大队和宋善久、陈永兰、高继真等匪部。

6 月

14 日,日军调动 3000 多日伪军,向东海根据地扫荡。东海县政府事先得知情报,安全转移。

17 日,刘少奇随第 115 师师部移驻赣榆县大树村,检查指导“双减”工作,并于黑林北秦埠地河



滩树林里主持召开重要会议。7月11日离开大树村。

23日,淮海行署决定撤销东灌沐办事处,恢复灌云县政府,并委原办事处主任孙笃生为县长。中共东灌沐县委改为灌云县委,由淮海区党委军事部长张克辛兼任书记。同时,建立中共灌东工作委员会,行政上设立灌东办事处,陈少新任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

海陵县政府派出黎辉为队长的工作队,在山西头村搞减租减息的试点。

新浦日伪军集结千余兵力,扫荡沐赣公路沿线,并在沿线建立三兴庄、桑墟、万匹等据点,分割抗日根据地,并连续向两侧“扫荡”、“蚕食”。

由海陵县武装、地方干部和滨海军分区敌工科抽调40余名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工作队的任务是开辟西从董马、白塔,东至海州,南靠陇海铁路,北到沙河镇的广大地区,把抗日根据地不断向东扩展。

7月

7日,八路军115师教导2旅在赣榆县西部马鞍山(后改名抗日山)建造的抗日烈士纪念塔落成。罗荣桓、黎玉、陈光、肖华、符竹庭、陈士榘、谷牧等参加落成典礼。

8月

2日,八路军第115师、山东军区联合在抗日山举行公祭大会,悼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代师长陈光、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副政治委员黎玉、政治部主任肖华等参加大会并致悼词。

10日,新四军3师10旅第29团配合滨海大队,对盘踞南岗的伪军第36师第72旅猛烈围攻。经过9天9夜的围困,南岗克复。

12日,淮海海军分区正式成立。淮海军区司令员罗荣桓兼分区司令,章维仁兼政委。

12日,牛山、房山的伪军联合出动包围了曲阳叔庄,中共东海县委组织部长叔子明被捕。不久,又有18名党团员被捕,其中13人惨遭杀害。

中共淮海区党委敌工部在灌云县建立情报站,任命吴泉友为站长。情报站下设同兴、吴集情报点。

日军利用叛徒、汉奸杨步仁伪别动队以所占据点为依托,对海陵解放区进行“蚕食”。

9月

赣榆县谷阳镇群众5000多人集会,斗争“夹山王”仲延泰,要求“夹山王”归还公山。在群众的威逼下,“夹山王”交出了霸山文契,群众斗争取得了

胜利。

赣榆县青年游击大队成立,何波任大队长。

东海县大队改编为淮海3支队第7团,团长先后有宋耀南、孙东初、崔维杰,政委宋云龙、李登云。

10月

19日,八路军第115师教导2旅第6团配合县大队,在赣榆海头、兴庄对日伪发动反“蚕食”战斗。经过半个月作战,击溃伪和平救国军第5旅1个团,毙伤伪军700余人。

月底,中共灌云县委决定划小区制。原沐五区分为曙红、汤涧、吴集3个区;沐十区改为官田区;灌一区分为李集区、兴集区;海二区与灌二区并为朱埝区。

日伪大举向灌宿海边区进行扫荡,淮海7团配合主力及民兵分头予敌打击。激战3日,夺回了周庄、雷庄、黑石埠、沙庄、旺庄等5处据点。

11月

3-8日,八路军第115师教导2旅第4团、第6团各一部,在东北军第111师第662团、57军独立旅及地方武装配合下,由教导2旅政委符竹庭统一指挥,发起海陵反“蚕食”战役。作战一周,攻克日伪据点16处,毙伤日伪200余人,俘伪大队长尹玉琢以下600余人。杨步仁之伪别动队第二、三、四、五大队及伪独立团全部被歼,杨率残部200余人逃窜。

下旬,中共淮海地委和军分区实行精兵简政,全分区划为4个地区,各设党的中心县委,统一领导与指挥党政军民的斗争和各项工作,并将第10旅第29团、第7旅第21团第1营与地方武装编为4个支队,分散活动于4个地区。中共滨海大队改编为淮海军分区第1支队第2团,团长汪洋;中共淮海军分区沐河大队第3营改编为淮海军分区第3支队第7团,团长宋耀南。

15日,日军华北派遣军以第17师团藤原联队为主,伪军第36师李实甫部及各县警备队为辅,计5000余人,向淮海区发动大“扫荡”。

12月

月底,淮海区的反“扫荡”斗争,经过1个多月数十次战斗虽沉重打击了日伪,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原配属新四军第3师的军独立旅又奉命回山东回归八路军第115师建制,致使淮海区的斗争处于极端困难的局面。



抢抓机遇开挖通榆河 北调江水梦想终成真

张卫怀

2010年7月7日,江苏省省委书记梁保华在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第一梯级站滨海抽水站启动了送水控制按钮,一泓江水滚滚北上,直达江苏省最东北端的赣榆县,这标志着1958年规划的通榆河开挖工程,经过几代江苏人抢抓机遇实施,终于在52年后全线贯通,圆了江苏北调江水的梦想。从此,在江苏省的版图上出现一条与京杭大运河江苏段基本平行的东部沿海南北向河道。

通榆河南起南通九圩港,北达连云港市赣榆县,全长415公里,是苏北沿海立足农业、综合开发的水利基础设施工程,是加快发展苏北、振兴区域经济的战略性措施项目,也是江水东引北调的既定项目,是江苏沿海水利、水运的骨干河道。通榆河从1958年规划,到2010年全线贯通,工程分南、中、北3段,江苏人抓住了3次大的机遇,经历了3期较大规模的施工。

抓住机遇搞规划,南段工程率先开挖

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到黄河视察。在黄河边的邙山,毛泽东望着滔滔黄河,提出了借南水以济北的构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借一点来是可以的。”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去往南京的

军舰上指示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抓紧南水北调工作。江苏人首先抓住了毛泽东提出南水北调宏大战略构想的机遇。

说起江苏人抓住这一机遇,不能不提一个叫陈克天的老人。

陈克天(1916—2011),江苏建湖人。1939年任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三梯队8团副团长,1949年任第三野战军第34军102师参谋长,1949年10月任南京市市级机关党委书记,1953年4月任江苏省水利厅副厅长、党组书记,1956年11月任江苏省水利厅厅长、党组书记,1977年12月任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任江苏省副省长,分管水利工作,是一位“老三八”、老革命、老领导,人们尊称他为“陈老天”。

1954年,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必须从流域规划入手,采取治标治本结合、防洪排涝并重的方针,继续治理危害严重的河流,同时积极兴办农田水利,以逐渐减免各种水旱灾害。”时任江苏省水利厅副厅长的陈克天除派出40多位技术人员参加淮委的淮河流域查勘和规划编制外,在省内采取省、地、县结合,上、中、下游结合,领导、技术人



员、群众结合的“三个三结合”水利规划编制工作。经过方方面面的努力,“二五”期间,江苏先后编制了包括“通榆河江水北调规划”在内的一系列水利规划,很好地指导了全省几十年来的水利建设,没有出现“书记调动,规划重弄”的情况。

1958年8月,省水利厅在《江苏省水利发展规划纲要》中制定了包括通榆河开挖工程在内的“淮水北调、引江济淮”规划。为了接通长江水源,还规划了泰东河,以连接泰州引江河和通榆河。1958年冬,通榆河南段即阜宁至海安157.7公里河段动工,10多万民工奋战在工地。到1959年春,开挖土方1800万立方米。由于摊子大、战线长,又遇“三年自然灾害”初期,人力、物力跟不上,工程被迫暂时停止。但其中的72公里河道经整修初步发挥了作用。

通榆河工程虽然停工,江水北调的努力没有止步。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陈克天带领水利专家赶到上海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苏北缺水和解决水源的想法,周总理高兴地肯定了江苏江水北调结合将来南水北调东线的正确设想,促成了江水北调“龙头”——江都抽水站工程的兴建。

1964年10月,根据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中央军委决定上马一项国防工程:在苏北沿海地区开挖一条结合交通、水利的苏北运河。该河计划南起阜宁县的射阳河北岸,北到响水县灌河口,沟通射阳河、废黄河、灌河和黄海,全长53公里。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亲临现场视察,并多次作出具体指示。这也是通榆河中段阜宁到响水段规划的河线。

江苏人又看到了机遇,省水利厅派出技术骨干,积极参加了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遗憾的是,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规划未能如愿实施。

抓住机遇上项目,中段工程再度实施

1984年,我国沿海地区开发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1月10—21日,省政府召开的全省计划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积极提高苏南,加快发展苏

北,建设海上苏东”的战略方针。5月,南通、连云港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对外开放城市。

江苏水利人发现了机遇,在省委号召的鼓舞和启发下,再次酝酿综合开发通榆河地区的规划和设想。在12月省委的一次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韩培信、省长顾秀莲指定陈克天、凌启鸿两位副省长负责研究通榆河地区综合开发规划问题,通榆河的综合开发列入了省委的议事日程。1985年1月27—29日,省政府在南京召开“通榆河综合开发座谈会”,成立了领导小组。

春节刚过,陈克天带领省内专家教授、有关部门和沿线4个市的领导及代表70余人进行了15天的考察。著名水利专家严恺教授、陈吉余教授、黄胜教授参加了沿线考察。经过考察,一致认为,通榆河地区的发展主要是受到交通、能源、水资源三大基础设施条件的制约,而这三大基础设施紧密相连和相互制约,港口离不开畅通的疏港河道和水陆交通网络,电厂发电需要淡水,水资源对能源、交通又有着制约。考察团研究制订了“一河、一路、两港、两站”综合开发规划。“一河”——开挖通榆河;“一路”——结合河堤修筑204国道;“两港”——建设灌河港和射阳港;“两站”——建设灌河口和射阳河口两座大型火力发电站。

通榆河的开发,从开辟新的水系来说,是江苏水利规划思想上的一个飞跃;通榆河地区的综合开发,是江苏对外开放、发展沿海地区经济、加快全省现代化建设速度的又一个飞跃。

为了尽快立项,1985年5月,古稀之年的陈克天带领有关同志到北京向中央有关部委领导汇报通榆河的规划和设想,拜会对苏北比较了解的老领导。在中南海,拜见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丕显,得到了这位老领导的支持;拜见了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张爱萍不仅支持综合开发通榆河,而且叫陈克天“带个口信,请省委、省政府对苏北要加强开发,不能两只眼只望着苏南”。在北京,还拜见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叶飞,看望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等。杜润生认为,“综合开发通榆河



地区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并表示“直接签署意见报送给万里副总理”。农牧渔业部顾问刘锡庚还为开发资金的筹措出谋划策，国家计委副主任黄毅诚叮嘱“要抓紧做前期工作”，做好方案。

回到南京，陈克天立即向省委、省政府作了书面汇报，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从1985年7月到1986年7月，用一年时间认真进行了前期工作，拟定了《通榆河地区综合开发工程规划要点》。

1986年8月，陈克天等带着图纸和“规划要点”再次进京。恰遇以强调发展农业为主要精神的中央北戴河会议刚刚结束。原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农业部副部长郑重等都赞成综合开发通榆河地区对发展农业的重要性。陈克天立即给中央写信，进一步阐明通榆河地区综合开发工程项目是一项“突出农业、综合开发”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请求中央首先支持开挖通榆河中段工程。在信的后面附了一份《通榆河地区综合开发工程规划要点》。9月6日，送交给陈丕显副委员长。9月10日，就转报给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等领导，“建议中央、国务院应该支持苏北通榆河地区综合开发的报告，请你们阅示。”胡启立阅后批示：“请杜润生、何康同志提出意见后，送耀邦、紫阳、万里、纪云同志阅示。”接着何康、万里也作了批示，胡耀邦、赵紫阳、田纪云在万里的批示后均一一圈阅；胡耀邦还专门批示国家计委副主任柳随年听取陈克天汇报一次。后来，国家计委副主任徐青接见了陈克天等人，表示“这项工程综合开发有价值，综合开发不能丢掉，整个过程可采取分期实施的办法，并且要按基本建设程序来办。”

回到南京，陈克天把在北京争取立项的情况和自己的建议向省委、省政府作了书面汇报。省委书记韩培信批示省长顾秀莲由省政府讨论一次，副省长凌启鸿作了具体安排。9月22日，省政府召开通榆河地区综合开发领导小组会议，常务副省长陈焕友到会并讲话。10月12日，省政府省长办公会讨论了通榆河工程的问题，10月15日，省政府即向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报送了《关于苏北通榆河地区讲

行综合开发的请示》。国家计委11月下旬函复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发苏北通榆河地区，发展农业生产和地方航运事业的设想是好的。”“国家视财力情况，尽可能予以支持。”12月中旬，胡耀邦来江苏视察，指出：“滩涂是江苏的希望所在！”

1987年1月9日，江苏省政府向国务院报送了《江苏省苏北通榆河工程项目建议书》。4月6日，国家计委函复省政府，强调此项工程“是必要的”。虽然工程被列为地方工程，但是前期工作照样抓紧进行，到6月下旬，初步完成了《通榆河工程设计任务书》的编制。1987年下半年，省长顾秀莲同意利用外资。1988年国家计委把通榆河列入了利用外资的评估项目；5月中旬，工程正式列入日本海外协力基金8000亿日元贷款的盘子。1988年12月，省长顾秀莲在《江苏省苏北通榆河工程设计任务书》上签字后，由省计委上报国家计委。按照国家计委的要求，省计委于1989年9月12日向国家计委上报了《江苏省通榆河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1990年10月，国家计委正式批准通榆河工程立项。至此，历时6年，陈克天从70岁跑到76岁，这项工程终于得以立项。

陈克天回忆说是专程赴京十四五次，和他一起跑项目的薛陵说是十六七趟，盐城市水利局档案馆长张绍力说至少有19趟。有一次在北京生病，陈克天是坐着轮椅上飞机回南京。1991年，为了催批可行性研究报告，他在中直机关招待所住了30多天，76岁的生日是在江苏驻京办事处过的。在陈克天的努力争取下，通榆河工程不仅被国务院批准立项，而且还为工程筹措了十几亿元资金。

通榆河中段工程主要在盐城境内，盐城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他们主动拿出2亿元搞“试挖”，试挖段选在滨海县的苏北灌溉总渠立交至废黄河船闸以南的7.8公里进行。1992年春开始现场勘察设计。按照传统的施工方法，至少要用8万名民工，还要占用大片农田。盐城人决定用“机械施工，一岸堆土”，1992年冬天用水枪冲挖通榆河，高压水柱从水枪中喷射而出，机泵抽吸泥浆，机械所到，河道成型，整个工地只用了3000名民工。这是江苏省大



型水利工程首次使用机械施工。试挖段不仅工程优良,而且减少征用土地 500 多亩、少拆迁民房 100 多户、节约征地拆迁费 1500 多万元。1993 年 4 月,通榆河中段其余工程正式开工。中段工程从海安至北六塘河长 245 公里,新开阜宁至响水段河道 56 公里,扩挖东台至阜宁段河道 120 公里,扩挖海安至东台段和泰东河接口段河道。到 2000 年,完成了东台到响水段河道 176 公里,形成南接泰东河、北通灌河的骨干供水和航运通道,发挥了显著的供水和航运效益。另外配套兴建了总渠立交、废黄河立交、响水枢纽、北六塘河枢纽、海安枢纽等水工建筑物,还有 18 座公路桥、31 个渡口,以及 241 座影响建筑物等影响工程。

随着一座座桥梁、抽水站、船闸的建成,通榆河中段从图纸已步步地变成了现实。2001 年,85 岁的“陈老天”视察通榆河工程,他抚摸着滨海段灌溉总渠与通榆河的交叉涵洞,十分感慨和欣慰地说:“我们要做的事,终于成功啦,了却了我人生中的一大夙愿。”

抓住机遇北延,通榆全河终于贯通

2007 年 1 月 1—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连云港,慰问苏北革命老区人民。温总理说:“连云港市连接南北、沟通东西,要好好规划加以发展。”要求把连云港建成振兴苏北的龙头、江苏省对外开放的新增长极。3 月 1 日,江苏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连云港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决定举全省之力振兴连云港。12 月 9 日,省委、省政府支持连云港开发的重点项目通榆河北延工程在灌南县长茂镇举行开工仪式,省长梁保华等领导出席,并为工程奠基。通榆河北延工程 190 公里,投资概算 49 亿元,其中送水工程 14.5 亿元,疏港航道工程 34.6 亿元,工程投资全部由省财政负担。送水线路南自通榆河中段北端的盐城滨海县境内大套抽水站,北上穿越灌河,经灌南县境内新开河道进入新沂河南泓,穿新沂河北堤入盐河北上至蔷薇河,利用沐南、沐北航道等,到江苏省最东北端的赣榆县柘汪工业园区。区间主要建筑物 22 座,其中地

涵 2 座、涵洞 3 座、泵站 4 座、水闸 12 座、滚水坝闸 1 座。在柘汪兴建一座大温庄水库,通榆河至此划上句号。

中共十七大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讨论时指出:“连云港的位置重要,是涉及全局的问题。”12 月,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牵头,中国工程院、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政府组织开展江苏沿海地区综合开发战略研究,希望通过连云港的快速发展,在上海和青岛之间崛起一座特大型海港中心城市,更好地服务苏北、沿东陇海线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2008 年 5 月 8 日,国务院总理办公会听取了课题组的汇报,温家宝总理要求进一步编制江苏沿海地区综合开发规划;8 月,国家发改委牵头 20 个部委到连云港调研,启动了江苏沿海开发战略的规划。2009 年 6 月 1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以连云港为龙头的江苏沿海开发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犹如和煦的春风吹拂着江苏,尤其是连云港的大地,加快了江苏,尤其是连云港的跨越发展,推动了包括通榆河北延工程在内的建设事业。

经过水利人 3 年的奋战,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于 2010 年 7 月 7 日全线通水,南通到盐城段引长江水 50 立方米每秒,盐城送到连云港境内 30 立方米每秒,到赣榆县相机送水 6 立方米每秒到 30 立方米每秒,3 级航道也于 12 月 27 日全线通航。

通榆河这项历时 52 年的民生工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支持下,江苏历届省委、省政府抓住机遇,锲而不舍,锐意进取,终于全线通水、通航,圆了江苏人江水北调的美梦,为全国南水北调提供了成功的实践经验。

(作者单位:市水利局)

责任编辑 邱仕明



贾圩百年巨变

韩世泳

贾圩,是个地名,现在港城中心城区龙尾河畔,也就是现在的苏宁广场附近区域。这里已成为海州区的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商贸物流圈。那么,这么一个繁华的商业中心,为什么叫这个“土里土气”的名字呢?这和这里的形成历史有关。

百年前贾圩问世

一百多年前,新浦大街形成时,这里还是一片盐碱荒滩。随着新浦大街商贸业发展,其辐射力、吸引力越来越大,这一带就成了东山根(云台山地区)和板浦一带的居民从马鞍山河讲新浦街和新浦人去云台、板浦的必经之地,并被人们踩出了一条小路。

民国元年(1912年),白宝山以“定武军第四路统领”身份带兵进驻海州地区。民国二年(1913年),白宝山手下驻新浦的部队中有个叫贾从龙的排长,为了把自己的家眷安在新浦,就选中这个交通要道口,在路边搭了几间草屋,在这儿安了家。于是,这里就开始有了人家。不久,从赣榆到新浦来谋生的陈姓、杨姓两家也在这儿靠路边盖屋落了脚。这两家都会木工手艺,尤其是陈家户主陈钟义,原是工艺木匠,他家盖的屋里也是柴笆泥

墙、茅草屋面,但样式上很有点特色,屋面是四面坡的“花轿顶子”。这一来,大大增强了这个地点对路人的吸引力,很快引来了胡姓、滕姓和魏姓几家新住户。

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陇海铁路铺到新浦,这里已聚居了几十户人家,成了像样的村落,村落中间也形成了一条小街。小街两旁也就有人家开了客栈、小饭店,或榨油,打大饼,或摆个茶水摊,以此赚点钱维持生活。过路行人也有了歇脚和吃住之便。这儿便自然成了新浦的“南门户”。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东南乡的土匪常到新浦一带打家劫舍“抬财神”,也都从这儿讲出,有时也会顺手牵羊地抢劫财物,弄得村落里的人整天担惊受怕,不得安宁。为



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贾圩街(俞永敬摄)



了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这儿的人家一商议,决定大家凑钱,挖筑护庄圩沟。庄子东有龙尾河,北靠陇海铁路,就在南边和西边挖沟,挖出的泥土堆在沟内侧,筑成圩堆,并在南边沟上搭一座小棚,以便夜晚看守。“圩子”成了得有个名字,附近圩子多以当地大家族或名人之姓命名。按此常规,村落里就数贾排长家的贾姓了。别看小排长在部队里不显眼,在这都是逃荒来的穷人家中间,可就是个不得而又不的了的人物了。而且,他家又是最早在此落户的,因此,大家便以贾姓来命名,“贾圩”就叫开了。

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侵略军为了加紧掠夺物资,在贾圩南首龙尾河上架了座木桥,名曰“兴亚桥”。抗战胜利后,东海县政府废除了“兴亚桥”这个名字,因其紧靠“贾圩”,便重新命名为“贾圩桥”。

解放前,石东镇在此兴办了石东镇中心国民小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也将其改称贾圩小学(1954年,改名为通灌路小学)。

1955年初,新浦地区的盐河、龙尾两区设置28条街,建立居民委员会时,龙尾区政府也以“贾圩”为主体,把这一片划为“贾圩街”,设立贾圩街居民委员会。以后,居委会地域划分几经调整,但至今这一片仍是海州区路南街道所管辖的贾圩社区。

贾圩之大变

贾圩从问世到形成新浦的“南门户”,都是一种自发性的民间行为。抗战前,新浦地区的发展建设主要是在大街的东端(今龙尾桥)、西端(今民主桥)之间(今民主中路)的北到临洪河(今新港国际小区处),南到前河(今市化路)地带,除此而外,无力顾及。日本侵略军侵占时期,日军为了掠夺物资,扩大侵略战争,从火车站(今和平桥东万

润怡景苑处)跨龙尾河向西开了一条大路,一直通到洋桥巷(今南极北路处)。因在大街之南,时称“南马路”(今解放中路西至南极路段),开始在此路两旁建设发展。可是,直到日军被打败投降时,也只盖了银行大楼和其他几座小洋楼。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又发动内战,新浦交通中断,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大街上都百业萧条,何况贾圩这个边远小街。

解放后,人民政府关心群众生活,重视城市建设。可是,面临一个濒临崩溃边缘、百废待兴的旧新浦,人民政府有好多急事要办,精力、财力诸方面一时难以顾及像贾圩这样外围地带的建设发展。贾圩街的道路仍是烂泥路面,路边依旧是矮茅草屋。195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来新海连市视察。不巧这天下了雨,贾圩街的盐碱土路面让雨水一泡,小汽车走在上面轮子直打滑,无法前进。胡耀邦等领导只好到通灌路小学传达室里躲了一阵雨以后才走。这年秋“大跃进”开始了,市委、市政府发动党、团员、机关干部和广大居民义务劳动,铺筑了一条海州到连云港的海连路,就从贾圩旁的贾圩桥上过龙尾河。之后,市政府又改造通灌路的铁路(今陇海商业步行街东街)至海连路段路面。1965年,进一步铺成了沥青



20世纪70年代末建成于贾圩街的陇海饭店(韩世泳摄)



路面。贾圩面临着一个可喜的发展机遇。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又让贾圩失去了发展机遇。所以,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贾圩街两旁依然是茅屋毗邻,只是增加了一些解放后栽植的树木而已。

贾圩真正的发展变化,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市、区党政领导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浦地区的商贸服务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市商业部门看中坐

落于交通要冲的贾圩这块风水宝地,决定投入150万元在这儿兴建大饭店,因紧靠陇海铁路,定名陇海饭店。1978年12月1日,陇海饭店建成开业。陇海饭店是个主体5层局部6层、建筑面积6600平方米,集餐饮、住宿、洗浴(内设碧波池,也对外服务)、理发(内有英蓉理发厅,也对外服务)于一体的服务企业。是当时全市规模最大、服务设施最好的饮食服务企业。当时就是放在民主路或解放路上,也是首屈一指的,何况建在贾圩。陇海饭店的建成开业,不仅彻底改变了贾圩街的破旧面貌,更给贾圩带来了繁荣兴旺。不久,在其北的通灌路旁先后盖起了上海饭店、国际大厦(后改称康平大厦)等商贸服务企业。贾圩一带很快热闹了起来,成了新浦城区南部的一个新的商贸服务中心。

贾圩,今日新浦最美的地方

21世纪以来,新浦进入了跨越发展的新时期,原新浦区区委、区政府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施“三产兴区”发展战略,并从改革开放发展实际出发,不断调整第三产业结构和发展战略,商贸业发展由发展传统的商业服务业,转向发展现代商贸物流业;



2014年9月底开业、建于原陇海饭店地段的苏宁广场(韩世泳摄)

商业街区发展由注重增加商业企业数量,转向注重规划发展商贸物流中心,特别注重以发展提速、层次提升、布局合理为目标,着力打造以陇海商业步行街为主轴,以通灌路、海昌路为两翼的商贸服务业核心商圈。地处通灌北路南首、海连中路北侧的贾圩地区,进入了全区着力打造的现代商贸服务业核心商圈之中。区委、区政府通讨招商引资,引来了苏宁广场项目。

苏宁广场总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主塔楼高180米。是由裙楼、三座塔楼和地下一层组成的大型建筑群,其业态涵盖精品百货、休闲娱乐、餐饮美食、电器零售等,集吃喝玩乐购于一体。

如今的贾圩,已成了新浦最热闹、最繁华、最美丽的地方。

(作者单位:海州区地志办)

责任编辑 于冰洁



对《新 安镇源流》 一点考证

耿中太 韩翠林

《新安镇源流》成文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刊载于清乾隆年间冯仁宏编印的《新安镇志》扉页上。该文记述了明崇祯九年(1636年)将张店镇之南的悦来集,正式命名为新安镇以及建镇取名的讨程和所雇人口的来源情况。这是一本最早记述新安镇得名和人口来历的地方志书,虽不全面,但脉络清楚。本文拟对其中有关“洪军奸散”与苏州阊门移民苏北的情形作一点考证,以期抛砖引玉,慎终追远,溯本求源。

《新安镇源流》载:“大明洪武登极之初,虐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奸散,谓之洪军奸散,子孙相承,定为世例。传至嘉靖,适奉旨击散,而苏之阊门周姓、常之无锡惠姓,以及刘、管、段、金皆被奸散,来至胸南,芦苇荒所,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后渐人烟日繁,乃知州请为民,州牧载入版图,是为里人。”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占领淮河两岸的大片地域。同年,置淮安府,领海、泗、安东三州,山阳、清河、沐阳、盐城、桃源、赣榆、天长、盱眙8县。旋又以泗州、盱眙、天长改隶凤阳府;并降安东州为县,仍隶淮安府,以邳州、睢宁、宿迁县改隶淮安府。时淮安府共辖2州9县。战乱使淮安及其周围地区人口逃徙殆尽,亟待移民充实。同时,江南地区的很多名门望族及地主阶级都依附张士诚。故明朝初年,政治上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从江南迁移大量人口到苏北一带进行垦荒。据《苏州市志》载:洪武初年,为加强国家统治,开发落后地区以及边远地区,实行戍边屯田制,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洪武三年(1370年)迁苏、松、杭、嘉、湖诸府之民4000余户至临濠垦田。二十二年(1389年),又迁苏州阊门一带商户百姓至苏北沿海灶区(盐区)。此后百余年中,陆续将江南的居民迁徙到淮安府境。据考证,祖籍是苏州者,主要分布在今扬州、淮阴、盐城三个地区。涵盖现在扬州、邗江、江都、泰州、姜堰、泰兴、高邮、宝应、淮阴、淮安、灌南、沐阳、宿迁、泗阳、涟水、盐城、响水、滨海、阜宁、射阳、建湖、大丰、东台、新浦、东海、灌云等地。明淮安府辖山阳、清河、盐城、安东、桃源、沐阳、海州、邳州、宿迁、睢宁、赣榆(地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淮安市、盐城市、徐州市和连云港市的一部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淮安府共接受移民23万人,约占当时总人口的36%。由此可见,



在淮南地区移民数量也是很大的。据民国时期《盐城县志》记载:朱元璋登基不久,为报复苏州、松江、嘉兴、杭州、湖州一带王府绅民对张士诚的拥戴,遂以移民垦荒为由,将王府 40 万人丁驱赶到苏北。楚州政协编印的《古代的淮安》也做基本同样的记载:“洪武三年(1370 年)苏、松、杭、嘉、湖诸府四千余户至临濠垦田……涟水、淮安一带的朱姓就是洪武年间奉旨迁来的……据说周姓字、宙二公当时就是和朱姓一起迁来的。”这一点,从《新安镇源流》文中提到的周、管等两姓氏宗谱记载中也基本得到印证。淮南《周氏宗谱》载:十世祖蓝公迁姑苏。延至十三世祖字、宙二公,元明鼎革之际,自苏州阊门迁海,居茆渚楼基庄(今新集镇周庄、金圩两村交界处)。周宇(1318~1384 年),字伯乙,原籍苏州。元朝顺帝至正年间,职授湖北荆州分巡道。待明立不仕,挈幼弟宙(字仲乙)及家人,自苏州阊门迁徙海州茆渚镇圈地垦殖,其后代在今新安镇小钱庄、小周庄、大周庄、武障河村、新东村、李集安圩等地繁衍生息,遂成为新安镇周、于、惠、管、汪、王、陈、赵八大家族之一。朱姓中当属朱洪为显,原籍苏州阊门,明洪武年间考中武探花,也奉命随朱姓家族举家迁至境内。从戎后,历任把总、千总、守备、参将、副将等职,后迁两淮总兵,督查海州沿海各港口军事要地,直到晚年卸职,90 岁卒,奉旨葬于茆渚蒲镇。淮南《管氏宗谱》载:吾族由明朝嘉靖年间,始从苏州阊门迁海来至朐南,芦苇荒所、人烟稀罕。涟水《孙氏宗谱》记载:明嘉靖初,因洪水为患与倭寇侵扰,时祖兄弟六人复由苏昆星散四往。

明朝初年将江南人口迁徙到苏北一带进行垦荒的历史事件,历史学家称之为“洪武赶散”,又称“红军赶散”“红巾赶散”“红蜆赶散”。“红蜆赶散”则是“红巾赶散”的讹传,可能是出于对红巾军的不满而将其暗喻为红蜆瘟疫的缘故。一般百姓对该场移民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不能理解,把这场移民看成是纯粹报复的行为,认为朱元璋对张士诚的部队和苏州居民恨之入骨,以至“士诚兵败身虏,明主积怒,遂逐苏民实淮扬两郡”。

元末明初,群雄并起,割据称王。张士诚拥兵苏州与朱元璋争衡天下。苏北地区是反元义军之一的

张士诚部崛起之地,也是后来各路割据势力相互兼并的主要战场。在苏北,争城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发生在淮县历史上的“硕项湖水战”就是一例),加上连年灾荒,苏北平原人口流失、户口凋零、田地荒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及张士诚兵败被俘,朱元璋遂“驱逐苏民实淮扬二郡”。《洪武实录》记载:江南苏州、松江、湖州、嘉兴、杭州五府,由于占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较发达,人口也较为稠密。这样,明王朝自然要把这里的居民迁往邻近居民稀少的江淮地区。明初洪武年间,数万甚至更多苏、松、湖、嘉、杭五府百姓在苏州阊门聚集沿京杭大运河北上迁至江北,到今日苏北等地生息繁衍。苏州阊门遂成了移民的出发、集散之地。

事实上,新安镇乃至苏北的古居民并非全是苏州阊门迁徙而来的。《新安镇源流》文中所记,金姓、无锡惠姓也是从苏州阊门迁徙至新安镇。事实并非如此,据《金氏族谱》记载,新安镇的金氏祖先,是在明朝中后期,由安徽迁淮海。新安镇《惠氏宗谱》载曰:新安镇惠氏,始祖权公,祖籍陕西扶风,明中前期由山东诸城来到海州,卜居新安镇。

综上,明王朝初期的“洪武赶散”事件,标志着明王朝从江南等地实行移民政策的开始,并持续实行至嘉靖年间近 200 年。淮南新安镇乃至苏北大部分人的先祖是苏州迁徙过来的。明初政权为了安抚新到移民,巩固政权,繁衍人口,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对所有的移民,提供农具粮种,并实施长达百年的免税政策,这一系列的利好措施,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因战乱迁出的原居民想要回流的问题。当然不排除,明王朝的移民还有抑制豪强,打击、分散反明政治势力的目的。现在看来,这一点并不重要,正是来自祖国各地、五湖四海的先民们栉风沐雨,辛勤耕耘,使今日的苏北大地历经沧海桑田,得以繁荣昌盛。

责任编辑 于冰清



凌州曾是煎盐处

——寻古云台十八村之十

伏广喜 阎祥富 杨庆昌



清《云台山志》凌州村图

东、西、北环绕着风景如画的青山，南面是一望无际的海水。朝潮晚汐，那一拨一拨的海浪不断地扑打着—溜山湾间一个不大的村子。这就是明清时期的凌州村。

从明清一些诗人的笔下可窥得其时的凌州大概的面貌。杨鏊：“八月广凌涛，江声涤烦襟。不若东海潮，如鼓成连琴。”顾坤：“于公澳旧址，逼近海潮边。朝夕吹风涛，常闻振鼓声。”

大海给人们带来诸多不便，但更多的还是馈赠。如在清乾隆时期，这里还是云台山南著名的煎盐之所。村南那个有名的于公瞳便是云台山南盐业重要的文化遗存。

何止是凌州。春秋时，古海州郁州山地区分布着众多的盐田。公元前514年，即春秋齐景公34年，齐相管仲就在这里有一段煮海的经历。汉文帝8年（公元172年），东海相满君在郁州所立的东海神庙碑上有：“源源海盐……民赖其利”等文字。汉时的郁州山下，盐滩茫茫，煎灶连片，此时的权威志书《史记·货殖列传》就明确记载：“彭城以东东海……有海盐之饶。”另据1992年东海尹湾汉墓出土文物考证表明，西汉朝廷已向东海郡的伊芦、北蒗、郁州三盐场派驻盐铁官，负责盐政管理、盐斤收购、上解、拨付等事宜。由此可知，汉时的郁州盐场在整个淮北地区盐业中的地位。

汉时，郁州山地区盐场范围有多大，现无从可知。而至三国魏（时郁州山地区归魏）时，虽无范围，但却有一个与范围有关的数字。其时，“郁州煎灶四百五十二”，灶为古代煮盐的锅炉，后引申为灶地、盐场。那就是说，在三国时，郁州山地区



已有灶地(盐场)452处。宋天元年(公元1023年前后)间,朝廷盐督在西距于公瞳4000米处的太平堰村设板浦场,辖东监、西监、西三、新坛4瞳,其时于公瞳为东监瞳。元至正28年(公元1368年),也就是明洪武元年,淮北盐场在郁州山地区设置徐渎场,为淮北地区四大盐场之一。康熙17年(公元1678年),徐渎场划归板浦场,其范围下辖于公、北献、大兴3瞳,覆盖范围从东礁山至胸山间。时拥有井滩120余份,盐滩数百处。清人程校对其时的郁州山地区盐滩有过精彩的描述:“一望青山下,池盐积似陵。晶莹初降雪,皎洁乍消冰。东海流应广,南风课有登。味饴堪贖贡,王膳最先承。”乾隆中期后,随着海退加剧,使引潮越来越困难,郁州山地区的盐田有半数宣告作废,仅剩大汪(井)、小汪(井)周边的引潮池滩。民国7年(公元1918年),大汪、小汪又废。随着郁州山南盐场废弃步伐不断加快,郁州山北的大片的盐田开始产盐,先后诞生的有沈圩、张圩、方圩、顾圩、大和圩等。郁州山地区盐田的变迁正是整个郁州海陆变迁的缩影。

在郁州的盐业史上,前面提到的那个凌州南3里的于公瞳,其影响与作用非凡。

淮北盐场至今还沿习着这样的一种习俗,即在每个滩头都插上一个小木桩,桩上钉有一块小木板,板上写着“于公牌”三字。这是为了纪念汉时一个叫于公的人。据说当时的于公是这里最早的制盐人,并将制盐工艺传授给了乡亲们。所以人们将于公所住的小村庄称为于公瞳。民间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它是在现实基础上演绎而来。

从百川先生的两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与于公瞳有关联的史料。一首为《凌州村》;另一首为《于公瞳》。第一首序中说凌州村“南有于公瞳,为汉相于定国(于公之子)故里,遗址犹存。”第二首序中说“关里村六里滩中”的于公瞳,“房基有六七十亩之大,相传为于定国基址。”至于《汉书》称于氏父子为郯人,那也没有错。因为汉时的于公瞳归胸县,隶属于东海郡。而汉时的东海郡早期称郯郡。后来虽然改为东海郡,但很多人依然称其为郯郡。所以在《汉书》中就呼于氏父子为郯人。它只是呼了他们父子的郡名,而未呼县名。而明人顾炎武在他的《郡国利病书》中,则明指为“东海故城(今南城)为汉于定

国故里。”

于公瞳作为盐业基地维持至乾隆年间。从其时编印的两本志书上可以看出:李普元的《东海志》上说:“(于公瞳)今皆斥卤,灶丁铺地产盐。”而到崔应阶、许乔林的《云台山志》中则说:“近被潮漫,池产俱废,移铺新滩。”两部志书相差时间也就二三十年。

前云台山南,有一条从凌州穿越而过的古老的河流。它始自板浦中正流向东磊,然后向东流至板桥后入海,它如一条长长的玉带,镶嵌于前云台山南这片美丽的土地上。这条河客观上方便了山南人的灌溉与排涝,但当初修河时可不是从水利角度来考虑的,而是为了方便到延福观和后来的三元宫讲香的香客沿途行船而筑,故名烧香河。

古老的烧香河,流淌着悠久而厚重的历史文化。明人顾乾的《云台山三十六景》之《凌州春柳》记录的就是其时遍生于凌州境内烧香河古堤上那片优美的柳林景观:“凌州村,在关里东北,背山面水,万柳争环,每至早春,新绿初齐,宛然如画。”张百川的《云台导游诗钞》在介绍凌州村时,也有“沿堤柳树数百株,天然屏障”的记述。试想,漫漫水天间,一条漫长而凸起的长堤上,一片曼妙的林带从眼前一直伸向远方。微风乍起,万千枝条,翩翩起舞,如仙女的裙裾,如绿色的珠帘,俨然一幅江南水乡图景。对这一风光,长居海州的淮安人吴之椿曾写诗赞之:“渐觉人烟近,村居水一湾。溪喧多漱石,屋矮不遮山。稚子惊行客,鸬鹚卧掩关。村路通鸟道,努力费路攀。”顾乾之弟顾坤也曾写诗盛赞这里:“何处垂柳盛,凌州万树从。轻丝凝晓露,飞絮舞晴风。碧漾山光丽,青涵冰色空。更闻莺语细,声渡绿荫中。”明洪武初(1368~1378年间),州人、大理寺理事王规奏筑的那条王公堰,“东起大岛,西抵凤凰城北”,其走向与古烧香河大体相同,是否这王公堰利用了烧香河堤,还是烧香河堤利用了王公堰,这有待进一步考察。

在凌州,最美的风景在大铜洞。

大铜洞,又名打铜洞。源于推磨山南坡东沟,流经火石庙东洞,折弯向东,沿洞汇集8条山涧,一直东下流入大铜洞水库,全长4.8千米。昔日的大铜洞两侧,为高崖绝壁,人称大讨道。北壁高三四十





凌州村大铜洞

米,南壁高约二十米。沿洞两侧混生着板栗、楸树、赤松、麻栎等林木。尤其是板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5个生产队,每年采收的栗包把所有仓库堆得满满的。当时由于自然生态没有受到破坏,大铜洞一年四季流水潺潺,草绿花红,人们进入这里,如同入仙境一般。从洞底向上可供游览的风景不胜枚举。刚入洞口,为熏窑门(又说轩辕门)。此处有被古人命名的薛仁贵石棺。其走向为东北、西南,大小与真棺差不多,非常逼真。石棺旁有天然的石桌、石椅。在石棺下面还有马眼石,石上有马蹄印。传说薛仁贵当年征东曾到此。出熏窑门不远,为当地人所说的铜矿。这里的洞底与洞两侧,分布着众多的黑色岩石,据说这些岩石含铜量较高,故而这条洞名大铜洞。张百川的《云台导游诗钞》也记下了它的所在。从他的《打铜洞》一诗中可看到,过去“两岸有金色石块二分对方,嵌入石缝,光辉照人,斑斓可爱。”铜矿向上,有一十多米长的招岸,古藤缠绕,险象环生。岸下有十余米的滑皮岸,约30度斜坡,光洁如镜。岸下分布着众多古老的自然洞穴。每个洞均曲折幽暗,左弯右拐,深不可测。滑皮岸向上,为石牛棚。一天然巨石,长约50米左右,宽近20米,面南。炎炎夏日,远离日光,凉风习习。如此大的天然石棚在云台山区恐绝无仅有。石柱石,在石牛棚上面,一大一小。大的10米多高。在不同的位置上观

之,有时像长方形立石,有时像圆形石柱,与花果山的定海神针异曲同工。石柱石下凌乱堆砌着众多的大大小小的石块,高高低低,古意盎然。当地人称豆腐块。石柱石向上不远,为滴水洞。一条涓细的溪流向下弯弯曲曲地穿过一条长长的石缝,不紧不慢,滴滴嗒嗒,声若闹钟。雨季,溪流则汇成一条飞练,又像一条银龙,在洞中不断地舞动。滴水洞上方,为外龙潭。其为一天然水潭,面积百余平方米,10米深,因其潭北岸有约10米高的悬崖,岸上有一跳台,因崖色深黑,似被火烧过,因名火烧崖。外龙潭向上约500米,为里龙潭,其虽小于外龙潭,却自成特色。其潭两侧和潭底均为细软黄沙,这些沙均为上游涧水携带于此,大自然为人们营造的一处独特的休闲游乐胜境。

以上这些景观,早在持续几十年的隆隆的开山采石炮声中和这些年挖掘机的巨铲下消失殆尽。洞的形状和过去也大不一样。昔日洞两壁是巨岩如削,深不见底。而今,巨崖已削为平地。在我们眼前到处是裸露、凹陷的山体,从山脚一直向山腰延伸。洞底,过去是跌宕起伏,曲折幽深,四季长流。而今,已沦为一条浅浅的小石沟,裸露于阳光之下。眼下,虽值雨季,却不见溪流,只有几个小水塘,有一些积水。

凌州村清末属苍梧乡,1929年属关里乡,1934年为关里乡第五保,1946年为连云港市第三区第八保,1947年为凌州保。1948年11月,连云港解放后为关里乡凌州村。1956年建凌州高级社。1957年9月为东磊乡凌州村,1958年8月为东磊公社凌州大队。9月为云台人民公社凌州大队。1983年7月至今为云台乡凌州村。今日凌州村东、西、北、南分别与山东村、后关村、云台林场、云台农场接壤,由河南庄、河北庄、东山庄、朱山嘴、南山庄、王屋基、于公庵7个自然村庄组成。

责任编辑 张伟敬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

(一)

刘凤桂

前言

连云港市古称海州。顾名思义,海州者,临海之州也。连云港位于我国沿海脐部,明《降庆海州志》称其“东滨海道,西掠徐邳,北控齐鲁,南蔽江淮……高丽、百济、日本在其东,风帆之便,不测可至。”依山傍海,山海相拥,交叉分布的海岛、海岸以及山地、丘陵、平原、港汊、河湖、滩涂是古海州自然地理的基本要素,也是孕育古海州历史文化的物质基础。其地形地貌基本由西部丘陵、中部平原和东部沿海基岩岸线三大板块构成。后冰期时代,气候变暖,冰川迅速融化,加之新构造运动作用,峡谷发育加快形成的沂、沭两河,流经鲁东南地区后从其尾间连云港地区入海,带来上游大量泥沙,形成冲积扇平原,为农耕文明的起始准备了物质基础。而历经600多年黄河夺淮,促进了古海岸线逐步向东推进和域境的扩大。

古海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又是西、南、北文化交汇之地。中原文化、江淮文化、海岱文化中的一些文化因子在这里交相辉映,争奇斗艳,在相互碰撞、交融、适应的历史进程中最终融入本土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州湾文化圈。纵观历史长卷,战争、水患造成民生灾难,大量的土地荒芜和人口逃亡曾经是困扰古海州发展的阴影;但每一次自然和社会的劫难之后,新的文明却又展现勃勃生机,社会向前发展。这就是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至

当代连云港地区人类的自身发展的与自然互动而相互交映的历史。

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是有“记忆”的,这个记忆很大程度上见诸记录这个城市的历史沿革。看上去所谓的历史沿革记载的似乎仅仅是改朝换代的地方行政建置的变更。但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它显然无法包括史无所载的石器时代,也无法诠释传说时代,实际上历史沿革的背后蕴藉着社会与自然变化发展的厚重内涵,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生态、移民、习俗等方面,跨越史前和历史时期两大阶段,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上还包括社会突变的革命性章目。一个城市的历史沿革就是她全部历史的一个“纲”,熟悉一个城市的历史,找回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需要从这个城市的历史沿革去把握,纲举才能目张。我们应该在历史沿革的变化中梳理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挖掘历史的真实素材,去进行当代人与历史的对话,将一串串偶然性的历史事件还原成历史发展必然归宿的链条,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做到“以史为鉴”。

做好城市历史沿革的学术研究,是地方史志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笔者初步写成的《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第一章:史前时代

一、文明的曙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海州
古海州自有人类以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



2—3 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其中距今 1—1.4 万年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后一阶段,亦即细石器时代。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我市考古工作者在市区锦屏山南麓的桃花洞发现了旧石器地点,并继之进行了遗址发掘,2004—2006 又连续三次对将军崖旧石器遗址进行发掘——包括西区的将军崖和东区的桃花洞两个地点,遗址面积约 2 万平方米;80 年代初,南京博物院考古工作者在东海县大贤庄,以及属于马陵山中段包括何山头、南山、石碑、茆顶子处发现了一批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后一阶段的旧石器地点,并进行了旧石器产品的采集和分类研究,由此揭开了连云港地区乃至苏北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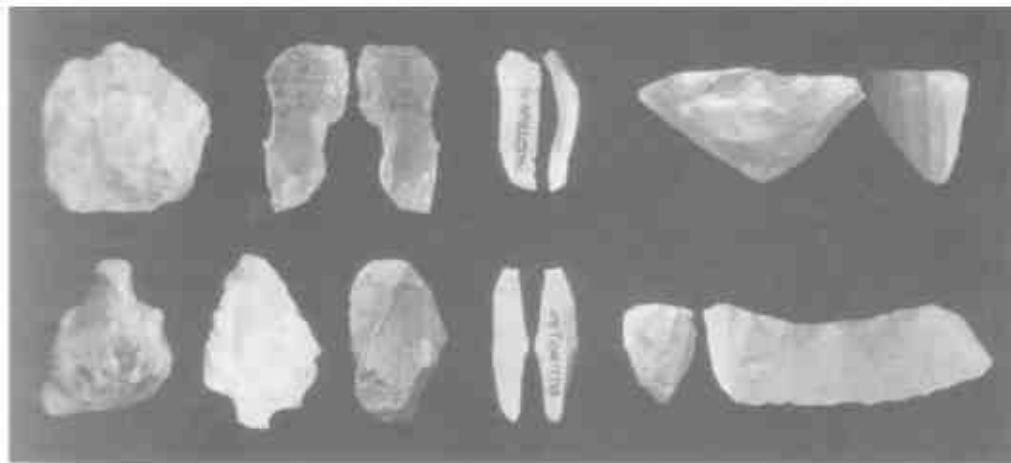
从已经发表的资料获知:将军崖遗址出土 1 处石铺生活面和 2 处很可能属灶坑的遗迹,以及 1500 余件石制品。石器的原料主要为石英、其次有燧石、水晶等。石制品的打片和加工使用锤击法和砸击法,间接锤击法占一定比例。工具素材以毛坯为主,砾石石器极少。工具类型以刮削器为主,以小型为主。石片石器和细石器各占一定比例。石器面貌与江苏南部有很大不同,而与中国北方的石片石器工业比较接近。发掘的石制品没有经过磨圆和分选,也没有明显的定向排列,表明它们基本上没有经过流水搬运,或仅有近距离位移。遗址性质应

该是古代人类在山麓坡积裙地带活动的遗迹。

将军崖遗址是江苏北部和山东南部地区目前发现的最好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重要遗址,具有较厚的第四纪堆积,多数石制品出自原生层位。对遗址堆积和层位的研究和年代测试表明,重要文化层的地质年代从晚更新世持续到全新世早期(距今 3—1 万年)。是江苏北部和山东南部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跨越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遗址,可靠的发掘资料是研究中国东部沿海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的宝贵资料。

关于马陵山中段的旧石器晚期石器工业制品,笔者曾撰文认为:这批细石器与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并援引贾兰坡先生的论述,把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划分为两大体系,一是“匠河——丁村系”亦即“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二是“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人遗址)——峙峪寺”,或可称为“船底状刮削器——雕刻器系。纵观第一地点——峙峪寺的发展,可见细石器的使用和制造,细石器的存在和发展是华北旧石器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这个特征在晚更新世变得尤为明显。联系将军崖遗址的三次发掘,大贤庄与将军崖所获得的细石器材料,如圆形刮削器、船底状刮削器——雕刻器,以及加工材料——燧石、石英、水晶等要素的一致性,两者地理位置同一

性——均为沂沭河下游尾间,可以推断它们同属于一个细石器文化区。大贤庄与将军崖所不同的是,前者均分布在晚白垩纪王氏组中——巨原层细砂岩岩层地带,产于残坡积相黄色亚砂土为主的层位中。周



将军崖遗址出土的石制品





东海县大贤庄遗址出土的旧石器(上石球、石核,下刮削器)

边没有发现磨制石器、陶器等新石器时代遗物;而后者有较厚的第四纪堆积,多数出自原生层位。故前者是当时人类进行季节性制作石器的场所,后者则是已过着原始聚居生活,从事狩猎生产的人类活动遗迹。另一个不同的是,将军崖遗址附近分布着较为密集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其中的二洞村遗址,作为山东后李—北辛文化的类型,在考古学年代(距今 8500—7500 年)上已接近细石器文化的下限年代和新石器时代开始年代(距今 1 万年左右),为我们研究连云港地区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发生的源头提供了线索。2008 年发表的《江苏连云港将军崖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考古发掘与收获》一文中就披露:遗址中“出现少量器型特殊的工具,如石刀和石镞,上部地层(T2301 第三层)包含了部分陶片,其时代较晚,可能进入新石器时代”。1975 年,连云港市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在南距桃花涧约 1 公里的酒店村附近的一处露天矿井中发现一批动物化石,动物种属主要有鹿、亚洲象、犀牛、水牛、马等,出于晚更新世至全新世湖相沉积的绿灰色地层中,伴出石英等原料制作的刮削器,特别是有些化石上还带有烘痕和刺痕。以上两例印证了葛治功、林一瑛两位先生在《大贤庄的中石器时代细石器》一文中所分析的:“中期细石器为没有灭绝的动物

化石和早期陶器伴出的中石器时代细石器”的观点。

将军崖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相对年代,有的研究者指出:“这里稍早的旧石器晚期文化面貌与近年来在鲁南清风岭等地点发现的石器地点面貌接近。在将军崖

遗址附近,大约一万年曾经经历过两次人类活动:一次可能在 2—3 万年前,保留旧石器原生层位;一次大约在 1 万年前左右,遗留细石器文化。”

山东鲁东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在郯城、日照、沂水、蒙阴等处还发现多起。重要的有沂水千人洞旧石器晚期居址、郯城黑龙潭旧石器文化遗址、日照双庙、竹溪村、郯城小麦城等处的旧石器地点,出土了一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材料。与连云港地区相比较,类型上,如圆头刮器、石核石器、尖状器等基本一致;制造技术上均采用直接打制法作用于石核坯或其它石器,产生不规则小石片。地域上同属于沂沭河流域,地形地貌也有十分相近之处。目前江苏和山东两省旧石器考古工作者的研究成果,都共同指出:鲁东南地区和苏北连云港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细石器时代古人类属于一种人种、一个起源和族属,具有文化的同源性。

贾兰坡先生把华北地区的旧石器分为两大体系,结合鲁东南及苏北连云港地区的细石器文化状况分析,距今 1 万年前,华北地区的细石器石片工业在这里已经相当发达,而且与贾先生给出的两大华北细石器文化系统存在渊源关系。也就是说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连云港地区古人类是从华北地区迁徙而来的。如果从旧石器晚期的细石器工艺传统来



看,似乎与“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人遗址)——峙峪寺”的“船底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更接近。

“海退人讲,海进人讲”,这是连云港地区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人类生存策略与环境变化互动的基本要素。距今 1.6 万—1.5 万年前的玉木冰期极盛期,海平面下降到 -150—-160 米,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是一片广袤的“黄海盆地”,这是晚更新世晚期以来海平面最低的时期。这个时期从华北高寒地带为躲避严寒和追逐野兽,沿着泰山山脉东侧而来的一批古人类来到鲁东南——连云港地区,并聚居下来。玉木冰期结束,天气开始回暖,冰川融化,海平面迅速上升,海侵开始。也就在距今一万年左右这一时期,海平面基本维持在现在的(其间也曾有多次波动反复)高度,连云港地区的古人类为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的需要,原始的狩猎经济得以发展。发达的细石器小石叶工业、氏族集体洞穴聚居生活,人类“群”的社会组织与自然环境天人互动,产生了天体崇拜的原始宗教意识。将军崖岩画中“基岩凹穴”凿刻被当代最新的科技手段——微腐蚀法测定为距今 1.1 万年左右,应该是细石器时代原始宗教在岩画上的艺术反映。

我们讨论一个地区史前年代时,特别是史无所载的旧石器时代,最需要借助于考古学的材料。由于当代环境考古学的兴起,它所综合运用的诸多高科技手段以及与传统考古学方法(如地层学、类型学)相结合,使我们能够最大可能地还原人类早期所处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从而能够得到许多量化的数据。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了解连云港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起源问题。

一、在传承关系上: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算起距今在 1—3 万年。其中经历有三个阶段——一是距今 2—3 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为华北主工业类型——石片石器工业;二是距今 1.6 万—1.5 万年的玉木冰期极盛期,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后一阶段,继承前期传统,开始出现细石器工具;三是距今 1.1 万前的细石器时代(又称中石器时代)阶段。三个阶段有地质层位上的先后继承关系,而最后阶段的细石器文化则为即将到来的新石器时代创造了

前提,准备了条件,展现了文明的曙光。

二、在区域文化上:与鲁东南地区的沂沭河流域属同一个旧石器时代文化区,都是以发达的小石叶工艺传统著称,在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中具有一定典型性;文化源头上,均属来自“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人遗址)——峙峪寺”文化系统。

三、经济生活上:以氏族集体洞穴聚居为主,从事原始狩猎经济生活并开始了早期的畜牧经济和采集经济,创作了反映原始宗教意识的将军崖基岩凹穴凿刻岩画。

四、文化形态上:将军崖岩画凿刻的最原始的“基岩凹穴”符号,作为文化形态,带有巫术性质,并且与经济活动有直接的关系,是古人类没有发明文字前的一种文化创造。这种“基岩凹穴”符号具有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同时又具有中国东部沿海连云港——台湾的传播学意义上的文化个性(因篇幅所限不再展开论述)。

五、文化交流上: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有专家认为,今日本福冈附近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2 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材料,在器型、石质原料和加工技术等方面与大陆沂沭河流域的旧石器非常一致,由此推断乃是大理冰期末期(即玉木冰期极盛期),从干涸的黄海盆地一路上追逐野兽而到达福冈一带的沂沭河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人类所使用的细石器工具制品。正如房迎三等先生所言:“黄淮地区的旧石器/细石器文化为研究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细石器工业关系的提供了重要资料。在东亚地区的旧石器文化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胸海书院)

责任编辑 张伟敏



『千岩万壑』续鹤缘

记东磊一组石刻的人和事

刘洪雨

东磊素以鬼斧神工、奇幻莫测的石海闻名,而散布其中的摩崖石刻更具独特的文化气息。经多年来的调查统计,东磊的摩崖石刻数量将近50余处,其内容或记事,或吟哦,蕴含的历史信息极其丰富。其中一组极具人文趣味的石刻作品令我尤感兴趣。

2013年10月5日,为了丰富《石上墨韵》一书的拓片资料,我与陈贵州、张义成三人作为市文物保护志愿者,受市重点文物保护研究所之托,赴东磊拓片。出延福观南侧偏门原有一条古道蜿蜒下行,南侧悬崖壁立,北望乱石磷峋,我们由此徜徉而下,即可见到数处勒石作品隐藏其间。尽管我数次经讨这里,但往昔皆一观而讨,认为此处与“千岩万壑”相关的系列石刻作品,无非是一般文人的附庸风雅之作,并未深究其作者的生平信息。这次拓片完工后经核实刻文与查询资料,我对分布在这一带的石刻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皆因该组摩崖石刻非凡,为俗子所为,实乃晚清金石名家的“雁过留声”之作,其中代表作首推“千岩万壑”。

“千岩万壑”勒于一倾斜崖面,刻文面北,距地两米有余。楷书。正文为:千岩万壑。另有跋:道光乙巳,长白德研香、州司马秦邮张小山、鄂渚任桃珊、江都田季华偕同鮑石牛炼师到此同游。抚琴者司马正襟危坐,夕阳在山,抱琴而去。落款:扬州田普实题。



东磊『千岩万壑』摩崖刻

赏读此段碑文,虽短短数十字,却精炼优美,实乃一篇情景交融的游记散文。其“抚琴者司马正襟危坐,夕阳在山,抱琴而去”一句尤其令人叫绝,一幅文人雅士在深山中自得其乐、优雅从容的恬淡画面跃然欲出,向往之情油然而生。

随着资料信息的不断汇入,发现刻文中有两位人物的生平不同凡响,即田普实和德研香。他们此次云台山之行不仅能遍访外市的石刻作品得到印证,同时还发生了一桩趣味盎然的奇闻。

田普实其人

田普实(1814—1849),字季华,后改名溥光。为清代著名学者刘文淇的女婿。有关田普实的生平,《扬州历史人物辞典》引用其墓志作了详细介绍:“田普实,监生,幼受业于梅植之,诵小学,工诗,搜访金石碑版,考订其词,孜孜不倦。篆、隶、浑古,得邓山人石如法,真、行亦入能品。高



才壮气,傲岸不群。一游京师,转侧齐鲁吴越间,皆无所遇……”田普实著作丰厚,著有《扬州金石记》《扬州金石话》《目耕斋笔记》《汉学堂诗文集》若干卷。该墓志对田普实的一生这样评价:“溥光访求扬州遗文其力,曾辑梁忠肱、于涣遗集刊行之,欲编《广陵文征》未果。编修汪廷儒辑《广陵集古编》,溥光举所搜集者相界。其好古而不诋名类如此。”可惜天妒英才,如此一个才华横溢之人却在他这次云台山之行后的第五年辞世,年仅36岁。其夫人刘氏谨尊父愿,守节终老。

德研香其人

德研香,名德林,字君直,为汉军旗人,汉姓阎氏。号研香、砚香、心僧、铁客、穹窿散仙等,嘉庆二十五年进士,曾官河南知府,迁盐运使。德林是清光绪年间著名书画家,为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包世臣弟子之一。因与时书法大家赵之谦等八人都居北京西城,且书画雅集,画笔不同凡响,被人称为“西城八怪”。清代《八旗画录》一书称其“书画皆工,兼精鉴别”“书法秦、汉、魏、齐之隶、篆、真、草”,以其“笔法云入画境,深朴苍莽”,奉其为当朝第一。并称赵之谦未发迹时,曾经学习讨德林的书法。只因后来赵之谦讳称所出,故世人知道者很少。但赵之谦37岁时,在致学者胡培系信中述道:“弟读《艺舟双楫》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自来此间,见郑儒伯所书碑,始悟卷锋。见张窈邻书,始悟转折。见邓山人真迹百余种,始悟顿挫。然点不解‘龙跳虎卧’四字,及阅研香来,观其作字,乃大悟横竖波磔诸法。阎氏学此已三十年,其诀甚秘,弟虽以片刻窃之,究嫌骤入。但于目前诸家,可无多让矣。”另外,德林还是北碑书法的狂热追随者,他在龙门石窟的古阳洞中,精选出《杨大眼》《魏灵藏》《始平公》等石碑,后来,洛阳知事曾索章又增选十碑,合二为一,这就是北碑书法中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龙门二十品。由此可见德林的书法水平确已具有极高的造诣。

镇江《焦山放鹤记》碑刻与东磊《千岩万壑》刻石的关联

德林、田普实等人这次云台山之行,著名的镇江焦山碑林有《焦山放鹤记》碑予以记载,其碑文即为德林撰文并书丹,该碑文首句即为:“乙巳之秋,游朐阳云台山,与石牛道士焦山之约。”所述的时间恰与“千岩万壑”勒刻的跋文时间相符,这就瞬间拉近了镇江焦山和我市云台山东磊之间的距离。该

碑文记载了道光二十五年(1845),德林携扬州金石家田普实及道士鲍石牛等一班挚友畅游云台山,第二天在海边得到两只漂亮的白鹤,这鹤的羽毛洁白如玉,拥有修长而美丽脖颈,清脆的叫声在从林山谷间回响。德林在碑文中形容为“玉羽修吭,声振林谷。翥杰清迥,潏绝凡禽……”他们很喜欢这两只白鹤,于是将两只白鹤带回了扬州。后来有一天,他们游历镇江焦山,在自然庵得到僧人墨溪和定峰的热情接待,他们想到了焦山的不朽名碑《瘞鹤铭》,认为焦山自古即是文士或隐士放养鹤的地方,于是,便将所得两只白鹤放养于自然庵的老梅树下,看着白鹤在梅花下翩翩起舞的优雅姿态,德林等人认为这样回归自然才是这两只白鹤应该具有的生活。同时,这也应该是道家们所信奉“天人合一”、返璞归真的具体体现。为了使这件文人雅事让更多的人知晓,便由德林亲自记录并书碑石,这便是焦山碑林中《焦山放鹤记》碑刻的由来。该碑书于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初五,而在前一年的秋天,德林、田普实、鲍石牛等畅游云台山带回两只白鹤,并勒“千岩万壑”于东磊崖壁,二者的遥相呼应实为一桩人文趣事。

尤为难得的是,德林等此次云台山东磊之行,并非只有田普实在此留下了“千岩万壑”这样珍贵的石刻作品,德林本人也不吝墨宝,在东磊的奇岩怪石间留下了“吞海”“引仙崖”“鼓琴石”“穹窿散仙鼓琴处”“拳石”等珍贵题刻。书体或隶或篆,赋予了东磊奇石灵动的生命。

此外,道士鲍石牛在东磊留下的“山灵石幻”“云海大观”两处石刻的艺术价值也不可忽视,他的书法风格介于隶篆之间,行笔自然流畅,独树一帜,别具独特风味。另有鲍秋涛的“海上仙山”、鲍春牛的“人间天上”两处石刻书法风格与鲍石牛极为相似,他们是否为同一人,尚待进一步的考证。

总之,东磊上述崖石刻的存在,极大地充实了东磊崖石刻群的文化品位,赏读之余,令人有超凡脱俗、气定神闲之感。通过对东磊与“千岩万壑”相关作品、事件及人物信息的了解与研究,能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此组石刻作品所应具有的艺术与历史价值,给开发东磊的文化旅游资源增添了新的亮点。

(作者单位:市汽车修理公司)

责任编辑 张伟敏



历史上的济南盐场

胡可明

济南盐场,并非山东济南所属盐场,而是江苏省淮北盐区灌河两岸的灌东盐场与灌西盐场共用的历史称谓。济南盐场虽较淮南十一场及淮北板浦、中正、临兴三场都较晚,但由于它先是由官方直接主办,后由官方倡导商人接办,经营管理采用资本主义制度,在产运销设施建设上另有新创,使得它具有与两淮其它盐场乃至全国盐场不同的一些特点。

建场时空背景

古老的两淮盐曾有几次大起大落。清咸同二朝时,太平天国运动兴起,长江航道梗阻。淮南盐斤的运输路径本就溯江而上行销湘、鄂、西、皖四岸引地,是故盐运不通,盐商怯步,如此便失去了自身广阔的市场,致“灶盐无商收买,煎丁有煎无售”(同治朝《淮南盐法纪略》)。客观上看,嘉庆朝后期,由于海岸线变迁,海潮渐退,淤积成陆,滩涂延伸,淮南盐区卤气趋淡,煎盐亭场及煎盐草荡离海日远,盐产逐年大减。咸丰八年(1858),淮南产盐仅为12万吨。至宣统年间(1909—1911),淮南总产额已不足10万吨,衰亡已成定局。两淮盐税,攸关朝廷财政。淮南盐产剧滑盐税锐减,晚清满朝皆惊。晚清朝廷以及后来的民国政府,都有用淮盐之利来偿还洋债、巩固统治政权的主观愿望和客观需求。事实是,远的不说,光绪二十一年(1895)4月17日签订的《马关条约》要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日本侵占

我辽东半岛归还我国,还要花3千万白银才能赎回。光绪二十七年(1901)7月25日签订的《辛丑条约》,赔偿八国联军要花9.8亿两白银。延至民国二年(1913)4月22日袁世凯北洋政府与外国银行团达成的所谓善后大借款总额达2500万镑,并以盐税和关税作抵押。这么几大笔巨额的外债靠什么偿还?盐,淮盐,全国盐!如何阻止淮盐衰落,确保朝廷金库盐利不乏,以维持动荡飘摇的晚清王朝,晚清上下众喘不已。

据晚清人王定安((1833—1898)在他主编的《续修四库全书·重修两淮盐法志》记载,至少在乾隆朝时,虽是淮盐鼎盛之期,却已发生淮南借运淮北盐的事实。《志》中记载乾隆十六年、三十三年、五十年、五十一年四次,其后道光朝十五年、同治朝四年,都曾发生讨淮南借运淮北盐。这一回,晚清朝廷不再只是考虑借运淮北盐,因为借运只是调剂余缺的权宜之计,并非是盐量的增加。从长计议,只有着实扩大淮盐的生产,尤其是淮北盐成本低获利厚、盐色盐味最佳,必须尽早扩产,以应付巨额外债和人口日繁相应而来的民食剧增及庞大的军费开支。

清末民初济南场建设

面对淮南衰亡可能陷两淮盐重创之危局,身为晚清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的清末大臣端方(1861—1911)经反复查考对比形成向皇帝的条奏:淮南盐向用煎法,成本远高于淮北晒盐。而其时



江苏沿海从埭子口向东南尚有很长海岸线未经开发,可以仿效淮北盐区现有池滩模式开发大量产盐池滩,以其产量弥补淮南盐产之减数,且成本等同于当时低成本的淮北板浦、中正、临兴三盐场,比之淮南煎盐,朝廷获利犹厚。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端方经奏请皇帝批准,拨借库款,在海州丰乐镇(现灌云县洋桥镇)西和五图河东一带海滩上,铺设产盐池滩40份,开了济南场建场之首。因是为接济淮南销售,是故取名为“济南场”,设场治于海州板浦镇。端方之意,先由政府开发,做个范例,以吸引商人投资续为大量开发,适时再将政府投资开发的池滩转让于商。后该处池滩果由同德昌公司与大阜公司分别收购。1908年,海州青隶州州丞汪鲁门和扬州大牛钱庄老板、淮南盐商叶瀚甫等集资42万吊,在淮北埭子口苇荡方营以东建圩18条(即大德头圩至十八圩。其中大德头圩1939年海啸时被毁),铺滩168份,定名为同德昌制盐公司。该公司后改名为大德制盐公司,公司设于大德7圩。清宣统元年(1909),很受端方总督提携的清末民初有海内盐务名宿美誉的张謇,以通海垦牧公司名义发起集资30万吊,委托为其打理通如食盐(牌号大咸)业务的徐静仁,在淮北埭子河口东建圩10条,铺滩80份,名大阜公司。次年至民国初元(1912),徐又投资15万吊,在紧邻大阜公司南建圩6条,铺滩40份,名大有晋公司。因其后公济公司又贴在大有晋公司东铺滩,民国三年(1914)已任北洋政府工商总长的张謇与徐静仁仍看中灌河两岸黄海滩涂是个铺滩产盐的好地方,又续投15万吊在灌河东为大有晋公司再建圩6条,铺滩40份。几乎在大有晋灌河西建圩同时,做过淮南盐场大使后升任两淮盐运使幕僚、熟悉盐政法例的陆费颂猷,应官方集资于淮北建圩铺滩号召,联合淮南盐商周扶九、萧云甫及任周、萧合办钱庄经理毕儒臣,先后集资达50万吊,靠大有晋公司灌河西6条圩子南,近燕尾港处,建圩24条,铺滩192份,成立了公济制盐公司,公司驻地后称为公济二圩。现江苏金桥盐化集团灌西盐场场部公济二圩仍有当时公济公司宅院遗存。同在

民国三年(1914),黄伯雨、李梅隐投资120万吊,在灌河西岸建圩4条,铺滩32份(于1933年转让于大德公司,如此大德公司名下有盐圩22条);在灌河东岸建圩40条,铺滩320份,成立大源制盐公司。吴沛牛、陈向辰投资48万吊,挨着大源公司灌河东圩滩南建圩20条,铺滩160份,成立裕通制盐公司;朱幼鸿投资50万吊,又挨着裕通圩滩南建圩20条,铺滩160份,成立庆日新制盐公司。延至此,济南场七个公司全部建立。

端方最初集资所建的海州丰乐镇西40份产盐池滩,终不敌海水侵袭,损毁于其后不久。后来于清末建成的同德昌、大阜两公司,及民初建成的大有晋、公济、大源、裕通、庆日新五公司,共七个公司,统称为济南场。据现有史料推断,可能是因起始于端方淮北建圩铺滩,故沿用了已损毁无踪的海州丰乐镇西原始的济南场场名。

济南场七公司共投资370万吊建成的盐滩,后定型共有145条圩子、1160份晒盐池滩,分布在黄海边60公里长的海岸线上,占有面积297.84平方公里,分属灌云县、涟水县,场署原设在灌云县板浦镇,后迁到涟水县陈家港。当时淮北盐区板浦、中正、临兴3场池滩共1954份,合并淮北晒盐池滩共达3114份。济南盐场的建成,为淮北盐区最终成为两淮盐区主体奠定了基础。

建圩与海运开两淮先河

按盐务署安排,济南场盐斤都由七公司自己负责运到仪征盐浦销售。后因通往仪征盐浦的河道日渐淤塞,河运愈发艰难。此时,七公司中有远见的公司着手海河并运了。1916年,公济公司就在燕尾港建筑盐埭2880平方米,堆廩36条,可储盐5万吨。同时花费8万元在海边建成一木质码头,以停靠海轮,并在距岸不远的开山岛上设报潮标和灯桩,在对岸小东港设有导航标,以保海运安全。还备小型机船一只,专为大轮进出港领航。1919年购置一艘2000吨级轮船运输本公司盐斤。到1929年11月,公济公司又对原码头进行改造,改木质一字型码头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T”型码头,可泊3000



吨海轮,使燕尾港最早成为淮北盐区盐斤海河联运集散地和出口口岸。

1917年,大源公司在灌河西的4条圩子所产之盐,大德公司在海州灌云县洋桥镇所设盐堆堆存的每年1200吨盐斤,均借用燕尾港公济公司码头海轮外运销售。这一年,大源公司购进小轮船装盐海运。以后,其他公司竞相仿效,单只轮船吨位增至2000吨。1918年时,大源公司在陈家港开支3.4万元自建码头,本公司盐斤全部实现海运。1919年,大德、大阜、大有晋三公司在灌河口北岸的堆沟港合资3.8万元,建成3000吨级德阜晋运盐码头。该码头全部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附设可堆存5000吨盐斤的坨地,并置铁轨车从坨地载盐包上码头装船,成为当时盐区首创。1920年,裕通、庆日新两公司仿效德阜晋合资建码头做法,集资3.9万元在陈家港建成裕庆码头,同步附建了盐坨。大有晋公司因其在灌河东还有本公司半壁江山,6条圩子40份盐池,在1919年参与集资建成德阜晋码头后,又于次年独资6.4万元在灌河东岸蟒牛港建成运盐专用码头,结构为木质与混凝土结合。至此,济南盐场七公司均有了独资或集资合用的运盐码头。1925年,济南场海运盐斤到扬州仪征盐栈,改散装为麻袋筑包成为时尚,盐务署令在各盐区推广。

1928年,国民政府召开盐务会议讨论决定,政府于次年安排淮北建官坨资金100万元,从淮板、中、临、济四场盐价中,以建坨费名义征收。因济南场产量大,所安排的坨容均大于淮北其他场,其中陈家港坨容420万担,燕尾港135万担,堆沟港250.05万担。码头和坨地建设及轮船购置,都为济南场盐斤运往销区提供了更加快捷的硬件保证。这些码头和坨地,有的一直被修缮、改造、扩展,使用到现在。

新型生产关系刺激了济南场的生产和销售

济南场建场担纲人端方、张謇都对资本主义多有所了解。端方曾于1905年考察英、法等欧洲十国。特别是张謇还对西方企业管理套路很为熟悉并

早有实践。端方起始、张謇接力而建成的济南盐场,仿效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式,七公司开发商就是资本家,产盐灶民和各级管理人员都是打工者。七公司都实行股份制投资、分红方法,有比较完善的公司章程,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设董事长、常务董事,监事会设主席、监事。由董事会推举总经理或经理,定期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对产盐灶民实行按产盐灶丁人数发放灶粮制为基础,加以按产量发放“担头费”的分配方法,相当于现在的基本工资加奖金。其经营机制完全不同于、先讲于两淮盐区其他各场。济南场的创新无疑要带来巨大的收益。有资料载,济南场全部建成达产后,前10年间年产海盐400—600万担,平均不低于450万担,以一场之产超过淮南盐区总产量,占两淮盐产5—7成,占全国盐产1成。《淮盐纪要》作者林振翰统计,1922—1926年,淮板浦、中正、临兴、济南四场5年总产782.79万担,占两淮总额881.64万担的88.79%,而济南场为441.40万担,占淮北总额之56.39%。解放后,济南场虽经建制调整,分分合合,但原济南场范围所产盐斤仍不失为两淮盐区之最。据济南场划分为灌东盐场与灌西盐场后两场场志所载统计,1949—2003年,两场共产盐斤2389.77万吨。建国前,质量管理采取“灌池池板重压,讲池卤水要滑,制盐要加温卤,收盐先要上坨,上廋驳运要分色”,济南场盐斤长期保有“色白、粒大、味鲜”之品位。解放后,灌东、灌西两场与两淮盐区各个盐场一样,不断改讲和采用生产新工艺,多次获得省优部优产品称号。

济南场以股份合作的模式,在当时淮北盐区乃至全国盐区都具有企业组织形式先进性和经营管理方式示范性,七公司生产力受到了强大刺激,开局十年产销两旺。济南场的强大生产力和高额产能,提振了两淮声威和商灶士气,也给政府打了气壮了胆,对政府的盐政政策和策略都产生了积极影响。1914年2月,民国政府盐务署令:鉴于淮南盐区产能下降和成本倚高不下,通泰盐场(淮南盐区)产额,年递减二成,五年减尽、终产。1915年,盐务



署核定济南场七公司与淮南各场,每年各在淮南引地(鄂、湘、西、皖四省)销盐 25 万引(每引实重 400 斤)。1922—1923 年,淮南盐产更为短绌,盐务署再次核定,配销皖南盐斤 45000 引中,全由淮北盐场承运承销,其中济南场 3.5 万引,板浦、中正、临兴三场共 1 万引。淮南食岸(江宁、扬州、通州、淮安、阜宁、盐城)所需之盐,亦由济南场与板、中、临三场按 7:2 比例配销。1923 年夏,鄂西缺盐,盐务署正式核准,轮运济南场盐济销,每担价上限为 7 两银。因济南场盐产长期持高,后又几经盐务署安排接济淮南之销,发展到几乎尽夺淮南销区而代之。抗战期间,济南场产量锐减,且盐斤大多被日军掠夺。解放战争期间,我军从堆沟港、陈家港、燕尾港抢运济南场盐 4 万吨左右,以济解放区之财政,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与革命战争有关联的几个史实

老灶民为新四军铺滩。民国二十八年农历十月十六日(1939 年 8 月 30 日),特大海啸袭击了淮北盐区,济南盐场淹死灶民 1600 余人,嗣后爆发的霍乱又死亡灶民 300 余人。幸存的济南场灶民失家失业,无以为生,大都举家外逃,有 3000 余人逃到了新四军控制的苏中解放区。1940 年,新四军和苏中抗日民主政府为安置逃亡来此的难民,也为了解决军需民食,利用阜宁北部海滩,筑圩铺滩晒制海盐。济南场逃来的老灶民愿开金、乔玉生等率先铺了两份八卦滩,晒制海盐,得到了抗日民主政府的扶持,取名为裕隆(过去有误为裕华)制盐公司。抗日民主政府号召“发展生产(淮盐)、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一下子吸引了裕民、裕成、裕丰、裕淮、裕源等公司第二年就争相来此投资,建造盐滩生产淮盐。1942 年,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民主政府也出资建滩晒盐。这一地域的盐滩后来发展成建国后的江苏八大盐场之一的新滩盐场。

资助我党和平谈判。1946 年 5 月 3 日,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周恩来、董必武率领的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 100 多人同日由重庆亦到南京,住入梅园新村。

那是一场非常艰难的谈判。虽曾迫使蒋介石当年 6 月 6 日下达东北的停战命令,为我军中原部队战略转移赢得了时间,但终因国民党反动派一心灭共,而致内战爆发。为了资助我党代表团,中华救济总署名誉主席宋庆龄通过关系,利用美军登陆艇,以救济总署名义,于 1946 年 8 月,到我军控制的苏北堆沟港,装运济南场盐斤 3 万担,按当时通用的法币价值达 7 亿元。此盐运到国统区销售,全部收入作为我党代表团驻南京办事处的活动经费。此次政治任务在当时是秘密进行的。

淮北盐区最先收复的盐场。抗战期间,新四军为了阻止日军掠夺济南场盐斤,筹措抗日资金,于 1944 年 5 月 4 日,由新四军 3 师副师长兼 8 旅旅长张爱萍直接指挥,一举收复被日顽统治下的陈家港镇。此次战斗缴获济南场存坨待运盐斤 48 万担。济南盐场盐量为两淮之冠,所以,解放战争时期济南场亦即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拉锯战不时而起。盐场人民记忆最深刻的是,日本投降后,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新四军 12 纵 86 团于 1945 年 9 月 18 日进驻接管了济南场,9 月 20 日抵达中正场的张圩坎之后,即受到国民党军队的阻拦。1946 年 2 月 9 日,国民党政府通过北平军事调解执行部的美方代表向中共提出,“迅速将盐场一律交还(国民党)苏北盐务管理局接管”,在军事调解执行部的周恩来、叶剑英予以严词拒绝。为了最后解放济南场人民,保护济南场盐斤,在此后的拉锯战中,我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1951 年经华北军政委员会和苏北行政公署批准,当年 10 月在陈家港建成了淮北盐场人民烈士纪念馆,有 43 位革命烈士长眠于此,其中大多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济南场土地上与敌战斗中光荣献身的。

(作者单位:连云港淮盐文化研究会)

责任编辑 邱仕明



连云港市发展红色旅游的资源分析与基本对策

徐 亮

近年来,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这种既能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又能放松身心、增加阅历的主题旅游形式越来越受到游客的欢迎,逐渐成为假日旅游、假日经济的一个新热点,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红色旅游”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在全国第二个红色旅游的规划纲要中,红色旅游的外延又作了拓展,范围又加上了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的革命遗址遗迹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纪念地。因此,“承载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革命精神的纪念地、标志物,以此为基础开发的旅游产品,讲行的旅游活动,都是红色旅游的内容。”连云港作为革命老区,是一块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同时,连云港也是一座在国内外拥有一定知名度与影响力的旅游城市。因此,把连云港地区相对丰富的红色资源与旅游业相对接,积极发展具有连云港特色的红色旅游,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革命传统教育、推动连云港市旅游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连云港市发展红色旅游的优势

1、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连云港具有悠久光荣的革命历史,无数革命先辈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在这块土地上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刘少奇、罗荣桓、陈毅、粟裕、张爱萍、陈士榘、韦国清、姬鹏飞、谷牧、万毅、惠浴宇等,都曾在连云港战斗过,连云港留下了众多珍贵的红色历史遗址、遗迹。据统计,连云港市共有遗址、遗迹 168 处,其中,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 68 个,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活动纪念地 14 个,革命领导人故居 2 个,烈士墓 41 处,纪念设施 25 个,其它已经损毁的遗址共 18 个。

2、优越的旅游产业发展基础。作为山海相拥的知名旅游城市,连云港除了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还具有丰富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旅游产业发展基础比较坚实。至 2012 年底,全市共有 4A 级风景区 8 个、3A 级风景区 7 个、2A 级风景区 20 个,省级旅游度假区、实验区 3 个,市级生态旅游示范区 2 个,市级旅游特色街区 2 条,特色旅游乡镇(村)5 个,农(渔)家乐 25 个。星级饭店 61 家,其中五星 2 家,四星 7 家,三星 30 家,二星 22 家。2012 全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1908.74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234.67 亿元,实现旅游增加值 115.2 亿元,占全市 GDP 的 7.2%。



3.便捷、通达的交通网络。连云港是全国42个综合交通枢纽之一,国家45个公路主枢纽之一,长三角地区7个国家级综合运输枢纽之一,已经初步形成了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管道“五位一体”的综合交通体系。

公路交通与城市公共交通方面,截至2012年底,连云港市公路总里程达11507千米,公路密度达每百平方千米151.1千米。其中,高速公路349千米,一级公路334千米。公路对外交通已全部实现高速化。拥有在册出租车2276辆,公交运营里程993.4千米,建成BRT一号线,市区形成1条BRT主线、6条喂给线、49条常规公交线路的线网布局。

铁路运输方面,有连云港东站、连云港站、东海站3个客运站。依托陇海铁路线,可直通北京、上海、南京、武汉、西安、太原、广州、乌鲁木齐等大中城市,连云港杨镇铁路、连盐铁路和青连铁路建设工程也在加快推进。

航空交通方面,连云港白塔埠机场于1985年3月正式开通民航班机,目前已拥有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大连等多条航线,全面推进新机场建设。

连云港市发展红色旅游的主要问题

1.资源保护不力,众多红色资源未得到有效保护。红色旅游只是最近几年刚刚兴起的一个旅游新

热点,加上红色旅游资源大部分都存在于相对偏远地区,一些地区的党委、政府对红色历史认识不够,保护意识淡薄。因此,众多红色资源并没有得到妥善保护,有的长时间处于风吹日晒雨淋之中。还有的在城市改造、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被拆除、损毁等。

2.红色旅游客源较窄,旅游形式比较单一。我市的红色旅游资源从目前来看,主要还是作为爱国爱党教育的平台,以青少年学生、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团员等为主要对象,经济方面的功能未被有效地发掘出来。同时,旅游的形式也比较单一,更多的是以静态的平面橱窗展示居多,辅之以讲解员的解说,有的甚至只有简要的文字说明。活动的方式还仅仅局限于参观浏览,缺少动态的、能让游客参与其中的旅游项目,吸引力、趣味性不够。

3.红色旅游开发程度较低,开发的意识较弱。受资金不足的影响,一些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一些红色旅游项目较为简陋,一些有重要影响力的项目没有深入挖掘整理出来,一些可形成规模效应的也没有整合起来,很多景点就是“一张桌子一条凳,两块床板一盏灯”而已,显得有名无实。

红色主题餐饮、旅游纪念品相对较少,服务的质量不高,各个景区吃住行娱购等综合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得不够完善,各个景区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软件和硬件方面的问题,服务人员的服务意识有待增强,从事旅游行业的经营管理人才缺乏,对旅游产业市场化运作的理念欠缺,开放方式还是以接待型为主,没有真正面向旅游市场。

连云港市发展红色旅游的基本对策

1.加强组织领导,整体规划、创新体制。红色旅游由于其特殊性,各地党委、政府在发展红色旅游的过程中,要发挥主导作用,强化宏观调控。各级党委、政府还应出台发展红色旅游工作的整体性规划,明确发展当地红色旅游的思路、目标、工作重点和相关制度等重要内容,做到既有长远规划,又有近期措施。



列入全国首批抗战纪念设施的红色旅游圣地——抗日山烈士陵园



要努力向市场化、企业化甚至集团化的方向迈进,创新管理体制,在保障红色资源妥善保护的前提下,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开发,逐步排除连云港发展红色旅游的体制障碍。

2、加大资金投入,加强景区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大对红色旅游事业的资金投入,加快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的“硬件”建设步伐,重点支持交通、水电、通讯、安全、餐饮住宿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红色景区的社会环境治理,教育群众,提高居民素质,在新农村建设中自然融入红色文化。修缮、兴建、保护好红色景点,要充分考虑红色景点的承受能力,防止过度开发,在合理保护环境、文物的前提下,提高红色景点的旅游价值。

3、增强宣传力度,积极推行旅游市场营销。增强连云港市红色旅游的宣传力度,为红色旅游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提升连云港市红色旅游的影响力。一是加强与传统新闻媒体的合作,邀请中央级、省级主流媒体来连采风、宣传;二是结合重大纪念活动及重要节假日,组织系列宣传推广活动,举办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三是利用网络扩大宣传,建设“连云港红色旅游网”,制作形象鲜明、富有吸引力的红色旅游网页,并积极链接到各大主要网站或旅游专题网站,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兴的信息沟通平台,及时发布连云港红色旅游相关信息,点面结合的把宣传促销的触角尽量延伸;四是采取“走出去”的方式,积极参加各种红色旅游推介活动。此外,还可以通过举办各种研讨会、节庆活动、征文比赛等扩大连云港市红色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4、创新旅游内容,挖掘红色景点潜在内涵。首先,针对连云港绝大多数红色景点静态、雷同、单一的问题,对各景点进行整体改造,采用更加科学先进的手段,如声光电技术,立体电影或互动展示等手段,提升景点的观赏水平;其次,因地制宜地增加游客参与性的游览项目,如模拟战争,穿草鞋、唱红



国家 4A 级红色旅游景区——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抗日战争时期展厅

歌、吃“忆若思云甘”等等;第三是结合连云港特有的红色历史,创作实景演出、红歌会、艺术节等活动,深化红色旅游的文化内涵;第四是努力开发具有连云港特色的红色旅游商品,发展红色旅游商品销售网点,在大型超市、商业区开设专柜、门店,扩大商品供销渠道。

5、树立大旅游理念,综合协调发展。树立大旅游的理念,通过区域合作、资源整合的途径去找思路、找市场。一是以连云港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山海旅游、民俗旅游为基础,相互结合,互为补充,使连云港山海风光游、人文景观游、生态游、民俗游与红色旅游形成一体,相得益彰;二是整合周边各省、各市如山东临沂、江苏徐州、宿迁等地的红色旅游资源,推动整个苏北鲁南地区的区域合作,以达到资源共享、线路对接、效益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

6、注重人才培养,提高从业人员综合素质。积极开展红色旅游管理人员、导游和讲解员的培训工,吸引和培养一批红色旅游研究、规划、设计、管理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建立旅游从业人员的绩效考核制度,将绩效工资与工资水平、能力、实绩相结合,建立服务质量评定制度、监督制度、激励制度等,鼓励大学生、教师、离退休干部等参与红色旅游志愿服务。

(作者单位:中共连云港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责任编辑 张伟敏

